

加拿大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加拿大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内 部 读 物 •
加拿大共产党反华宣言

世界知嫌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0.65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frac{5}{9}$ · 字数 102,000

1965年7月第一版 1965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56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給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1964年7月，已经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倫，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党员，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閲讀利用。

本书包括加拿大共产党自1963年7月15日至1964年11月的材料，共計二十五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 | |
|------------------------------------|----|
| 《加拿大論坛报》社論： | |
| 爭取和平的斗争是最高的責任..... | 1 |
|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員会的声明： | |
| 遺憾未取得进展..... | 3 |
| 《加拿大論坛报》社論： | |
| 中国和禁試..... | 5 |
| 萊斯利·莫里斯： | |
| 和平共处是帝国主义的失敗..... | 7 |
|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组织工作負責人納尔逊·克拉克： | |
| 加拿大和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国的建議将損害 我国的斗争..... | 14 |
| 《加拿大論坛报》編者的話： | |
| 讓我們把事情說清楚..... | 20 |
| 蒂姆·布克： | |
| “稻草人”和“以暗諷进行裁判”..... | 23 |
| 蒂姆·布克： | |
| 歪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 | 29 |
| 萊斯利·莫里斯： | |
| 幻想对現實..... | 35 |
| 蒂姆·布克： | |
| 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 | 42 |

| | |
|---|-----|
| 蒂姆·布克: | |
| 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 48 |
|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 |
| 加拿大共产党认为需要召开世界性会议..... | 54 |
|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 (1963年11月15日至18日): | |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议..... | 55 |
| 莱斯利·莫里斯: | |
| “左倾”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哲学..... | 59 |
| 莱斯利·莫里斯: | |
| 《今日的问题》序言..... | 75 |
| 伯特·怀特: | |
| 在中国逗留了四十四个个月以后..... | 78 |
|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 |
| 中国人的“分裂活动”遭到反对..... | 84 |
| 蒂姆·布克: | |
| 列宁早就揭露过中国领导人在今天的运动中 所使用的分裂的策略..... | 85 |
| 加拿大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4年3月 27日至30日) 决议: | |
|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 91 |
| 伯特·怀特: | |
| 苏联专家为什么回国..... | 93 |
| ——关于对中国援助问题的报告 | |
| 蒂姆·布克: | |
| 维护团结, 反对分裂..... | 99 |
| 伯特·怀特: | |
| 中国: 幻想与现实..... | 104 |

| | |
|---------------------------|-----|
| 伯特·懷特： | |
| 在核邊緣的那边..... | 121 |
| 蒂姆·布克： | |
| 迫切需要召開會議..... | 125 |
| ——對記者的談話 | |
| 蒂姆·布克： | |
| 團結問題和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的必要性..... | 128 |

爭取和平的斗争是最高的責任

《加拿大論壇報》社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列宁主义万岁》一书中提出了他們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自从1960年4月此书出版以来，加拿大共产主义运动就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并且是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防止世界大战和实现和平共处的责任格格不入的。

現在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领导权，这种责任特别重大，而这种责任特别沉重地落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肩上。

在1960年11月，在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拒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声明上签了字，声明规定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切地方的一切共产党人的首要责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怎样实际上抛弃了他们的签字，并重新发动攻势，争取实现他们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理論”，这可以从他们在6月14日给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中看出来。在整个一系列問題上，他們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把任何不同意他們的意见的共产党称为机会主义的。

苏共给它的党员的信件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它不仅是以苏共的名义回答的，而且是以1960年的声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同意的纲领——的名义回答的。本报对苏共的这封信表示祝贺，因为它保卫了1960年的声明的伟大原则，把世界和平放在第一位。

尽管中国发言人表面上赞成和平和和平共处，他們在实践

中实际上否认和平和和平共处。他們口头上贊成和平，而事实上只有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环境中每天不断为爭取和平而斗争，才能赢得和平。目前在莫斯科进行的討論停止核試驗問題的會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人如果奉行中国共产党的刻板、不現實因而是危险的方針，不为爭取和平解决而奋斗，这就不仅要冒热核战争的危险，而且实际上は鼓励热核战争。那样将会解除千百万爭取和平的人們的武装，并使主张进行預防性战争的人正好得到他們想要首先发动核攻击的借口。对中国和苏联关于古巴危机的观点进行研究之后将能证明这一点。

加拿大共产党在去年12月17日向党员发表了一封尖銳抨击中国立場的信。

加拿大共产党执委会在7月12日写給全国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說，中国共产党在同苏共会談前夕发表它的6月14日信件的用意是要破坏会談。

一切渴望和平和美好生活的人們，都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而深感不安。他們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各党的分歧并不是关于学术問題的，而是涉及一切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的。

中国共产党人應該重新检查自己的意見，考慮大多数共产党的意見。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委会在去年12月的信中以下面这一段話提出了这样的建議：

“我們希望中国共产党将重新使它的觀点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起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对于劳动人民与和平事业的后果将是不堪設想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團結起来，将能加速和平的胜利，并加速建立和平共处的条件。”

(譯自1963年7月29日《加拿大論壇報》附刊)

遺憾未取得进展

——加拿大共产党号召：研究、討論双方的观点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間的双边会談沒有取得任何可觀的进展即告休会一事表示遺憾。

党的声明說：“当訪問这两个党的加共代表团五月間向全国委员会彙报时，人們希望即將到来的苏中两党会談将为分歧得以解决、團結得以重新建立的下届全体共产党會議提供适当的气氛。我們希望这一点在将来的會議中能获得实现。

“十分明显，中国党在双边会談前夕对1960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党會議上一致同意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方針发表大量的批評以及中国党后来在会談期間的种种活动，其目的并不是要促进达成協議，而是要阻挠达成協議。

“中国党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許多国家中进行宗派活动；他們在我国同托洛茨基分子发生了直接接触；这些宗派活动破坏了規定兄弟党相互之間关系的行為准則。

“加拿大党曾对停止公开論战以待直接会談的協議表示欢迎。中国党发表6月14日的信就破坏了它所贊同的这项明智的協議。

“目前出現了这样一种情况：分歧再次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公开地当众討論起来。

“我們将继续討論这些問題，并将为世界运动在馬克思列寧

主義基础上的團結而努力。

“我們的党在过去三年的过程中常常討論中国人的立場。其中也包括了同中国领导人的直接会談。

“在我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全国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都一貫采取这样的立場：中国的政策是和处在加拿大条件下以及目前世界形势情况下的共产党人的任务不相容的。

“我們党于1960年在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上签了字，我們遵循我們同所有的党一道积极参加制定的这个历史性文件中所包含的原则、战略和策略。

“我們党在1954年通过的、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加以修改的纲領，是和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完全一致的。我們坚持我們的纲領——《加拿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們将要继续說明我們的观点，并将尽力恢复澄清，并将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八十一一个党声明的原则基础上的最大限度的團結而努力。

“我們号召我們党的党员和我們党的支持者研究并討論目前的分歧，仔細地閱讀《論坛报》上发表的例如中苏两党最近的信件以及我們党表示不同意中国党的立場的12月7日致全体党员的信。

“團結一切共产党人的原則要比暫时的意見分歧伟大得多。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当資本家或任何其他人正如人們所預料的，企图歪曲或利用这种分歧的时候，我們切不要忘記这一点。”

(譯自1963年8月5日《加拿大論坛报》)

中 国 和 禁 試

《加拿大論坛报》社論

《加拿大論坛报》支持禁止空間、大气层和水下的核試驗，认为这是走向世界和平的良好步驟。这只是部分禁止試驗，却是裁軍和最后禁止核武器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胜利。條約本身对全人类都有很大价值，因为它将終止放射性微粒毒化空气的状况。

我们认为，加拿大政府声明表示願意遵守禁止試驗，是一种符合和平利益的行动，并且响应和平运动的要求。

不仅如此，这为达成旨在緩和紧张局势和最后消灭战争作为解决各国之間的爭端的手段的新協議的气氛正在好轉。

因此我們讀到中国政府的声明感到很吃惊。它在声明中譴責部分禁止試驗是向帝国主义“出卖”。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部分禁止試驗是在世界和平事业中取得甚至更大成就的一个步驟，它除了对各国人民具有价值之外，对中国人民也是具有价值的。

中国領導人在他們的声明中还說，一項爭取和平的計劃如果不禁止和銷毀一切核武器，拆除外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并建立无核区，那末這項計劃必定是毫无意义的。

他們以此与部分禁試針鋒相对，这样推理說，如果我們不能一下子通过整个和平計劃，那末我們就必须拒絕部分禁試，认为它是对和平事业的背弃。

他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异想天开和不現實的世界里。

他們有沒有想过一下，走向和平的道路岂不是逐步为达到最終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嗎？难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嗎？什么时候最后目标能一下子就达到的呢？

《論坛报》认为，它支持部分禁止試驗，就是在为希望和平的一切加拿大人发言；当它說，爭取和平的斗争必須继续爭取完全禁止一切恐怖武器、废除加拿大領土上的外国軍事基地、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反对給加拿大核武器，它就是在为希望和平的一切加拿大人发言。

中国的声明說，正是由于部分禁止試驗，这些目标已被放弃，这种說法是多么駭人听聞。

北京的这种完全不現實的推理方法——爭取和贏得部分胜利就是放弃最終目标——也是中国在其他問題上的看法的特点。

譴責禁試是一个实际证据，证明他們的理由是錯誤的。

（譯自1963年8月12日《加拿大論坛报》）

和平共处是帝国主义的失败

——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萊斯利·莫里斯

《加拿大論壇報》发表了苏联和中国两党的往来信件，从而为讀者作了一次服务。

有人会說，这是两个大国的两党之間的紛爭，因而“他們”一定要自己解决；其他的人可能认为，这个問題“太大”，他們自己解决不了；还有的人可能急躁地喊道，“讓他們都見鬼去吧！”

这些情緒可能是出于痛心和遺憾，认为共产党中两个掌握近十亿人民命运的大党竟然中了資本家的下怀而彼此不得不公开地破口大罵起来，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两党之間的紛爭問題，尤其不是什么感情用事的問題；感情用事或急躁情緒是解决不了这项爭端的。

两条不同的行动路线

这里所涉及的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的关于对目前世界的两种看法問題——这些不是消极的、空論的、与我們无关的看法，而是决定政策和国家行动的看法。简单地說，它們是全人类命运所系的两条不同的行动路线。这就是馬克思主在当前世界上的动力。

看法上的分歧已经导致了不同的行动路线：中国同苏联以及大多数共产党对于印度边界糾紛的态度有分歧；在世界和平

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其他团体里也已经出现了分歧；現在又出現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最为尖銳的分歧：中国人譴責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試驗，他們公然不顾大多数共产党和除中国及法国以外的几乎每个政府——更不用說认定部分禁試是走向彻底禁止核武器和裁軍的一个步驟的人类中的絕大多数——都贊同部分禁試这一事实。

一步步的政策遭到拒絕

中国共产党口头上自然要說他們是拥护和平的，但是他們在当前的現實世界中却拒絕了爭取和平的实际斗争。讀一下他們那封包括二十五点的信件，就可以看出他們表示拥护和平共处和裁軍的时候，恰恰拒絕了那些妥协和一步步斗争的政策（部分禁試就是一例），而只有采取这种政策才能使得这些事情有实现的可能。

哪个工人根据自身的经验不懂得，爭取美好的生活的斗争乃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哪个工人不懂得走向星辰是没有捷径的？

其实，一个人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同时却又拒絕那条走向这个目标的多石的崎嶇小徑，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拒絕目标的本身而大肆贩卖詞藻。正如馬克思所寫的，在取得知识方面是沒有一条“平坦的大道”的。目标的本身就包括了达到目标的手段。

在他們的最后一封信里以及他們所有的許多文件里，尽管这封信以纲領的形式总结了一切，但中国人却把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社会主义的斗争截然分开，正像他們把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殖民地的革命截然分开一样。

他們看不到，爭取和平、爭取挫敗帝国主义表現其毫无人性的和好本性的任何企图的斗争，乃是使社会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并永远消除战争和帝国主义根源的阶级斗争的真正核心。这是在无所不包的、世界范围内的斗争。

如果可以阻止帝国主义使它不能表现它的真正本性；如果帝国主义唯恐自己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遭到毁灭因而不能再把战争作为同它的社会主义敌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那不正是帝国主义可能遭受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最巨大、最广泛的失败吗？

战争的崭新性质

这里，中国人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作为政治的其他手段的一种继续，现在已具有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性质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暂时消除了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威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一次避免了在希特勒统治下死灰复燃的同一个德国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且在这次战争中同时想要消灭苏联的企图不仅遭到失败，反而促成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内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体系的诞生。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够暂时地或部分地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任何争端或作为当前世界的主要争端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端呢？看来不大可能。热核战争不是坦克、机关枪、甚至也不是毒气。它能渗透一切、破坏一切。

后一个事实——战争从本质上所具有的新的性质在我们时代的一切事件上都打上了它的烙印：打在帝国主义的政策上，打在社会主义的政策上，打在波澜壮阔的和平运动上（和平运动要

不是把原子弹作为它的斗争对象的話，它就不可能获得它目前的这样的力量，因为常規战争的威胁絕不可能产生目前的和平运动）；也打在殖民地的革命上，因为帝国主义以“老一套”办法进行干預的能力，在这里也受到了現代战争的性质的限制。

古巴是新局势的有力的証明

古巴岂不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嗎？要不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具体以苏联的言行为共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拥有和五角大楼所拥有的同等数量或更多数量的热核武器，难道美国不会像过去消灭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革命那样毫不迟疑地消灭古巴革命嗎？

中国领导人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願看到这一点。我說他們是不願看到，因为他們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明明知道这些事实。他們都是具有特出的軍事经验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爭論是一次围绕着馬克思主乂原則的爭論；是把馬克思主乂当作是在一切情况下的行动指南和把“馬克思主乂”当作死教条、扣字眼，也就是理論脱离实际之間的爭論，而理論脱离实际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乂。

这就是目前爭論的問題。

到目前为止，除了通过辯論来解决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有关理論的与实际的爭論外，历史上还没有提供过其他解决的办法。进行辯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召开联席會議。現在可以看出，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的會議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意見。虽然中国領導人在說明各个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爭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的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上签了字，但是他們現在又不同意了。

他們也曾簽字表示同意強調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在目前新的世界形勢下帝國主義戰爭不是不可避免和譴責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所作的決議具有的歷史性質。他們現在却拒絕這個決議。

不幸的是，目前共產黨人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在一場世界範圍內的辯論中討論這些問題，也就是要一直辯論到找到某種辦法可以在會議中取得一致的意見。至於召開會議，那就必須有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協議、並且遵守協議的意願。

加拿大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朋友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并在不受任何想要利用這次辯論來達到其反共目的的人的那種不合時宜的影響或恫吓的情況下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是牢牢記住目前世界形勢的幾個突出的特點：

(1)正是由於蘇聯人民取得了政治上、社會上、技術上和科學上的成就，我們才能夠談到和平共處。要是沒有蘇聯，沒有蘇聯人民的自我犧牲，也就沒有世界和平的前途。這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个客觀的、可以找到證明的事實，並不是一種片面、主觀的解釋。

爭取和平的鬥爭不是後退

(2)因此，帝國主義才不能夠自由地、毫無拘束地發泄它那強暴的、好戰的本性。雖然它的本性沒有改變，但它表現它的本性的能力卻永遠被削減了。這一點是近代史上一個可以得到證明的事實，正如在朝鮮、匈牙利、蘇伊士、黎巴嫩和古巴的危機中所表明的那樣；今后還會一再出現這種事實。而且它的實際存在也是與中國領導人的主觀看法大相逕庭的。

(3)爭取和平、和平共處和裁軍的鬥爭不是後退和投降，而

是一項属于亿万人的、由亿万人所制訂、并代表亿万人的利益的反帝政策。行动起来的亿万人在防止战争并且迫使帝国主义者达成協議中所进行的斗争，在爭取这些協議付諸实施中所进行的斗争，实际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本性、反对它的那种存在形式的斗争，这是近代历史中的史实。这就是和平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好的盟友的原因。

如果可以防止帝国主义以战争手段来解决爭端并把他們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一点，由于帝国主义被削弱、由于战争的新性质、社会主义的威力和和平的力量，現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帝国主义被迫停止制造战争这一行动本身，确实就使帝国主义遭到巨大的失敗，并在其他的阶级問題上大大地打开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具有好战的本性，所以爭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实实在在的失敗。

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

有人说，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以及不承认中国等等之中得到解释。

根据同样的理由，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人当然也同样有理由可以采取僵硬的、教条主义的和不现实的立場，因为有誰曾经遭受过比苏联各族人民在漫长的抵制、破坏和不承认的年代中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破坏更为惨重呢？

不，問題絕不應該从任何这样的立足点来下判断。共产党人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国家里，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馬克思主之所以具有无限的力量，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真理。如果这个

或那个国家的历史特点或特殊問題被上升为原則的話，那么原則也就不成其为原則了。

馬克思主乂學說和馬克思主义的論理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的。它是一門世界性的科学。

(譯自1963年8月12日《加拿大論壇報》)

加拿大和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国的 建議將損害我国的斗争

——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组织工作负责人 納尔逊·克拉克

加拿大共产党已经很清楚地陈述了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分歧的意见。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的批评，不仅是基于一种同中国共产党人持有完全不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而且也基于我们在加拿大的经验。

坦率地说，如果把中国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議”运用于加拿大的话，将使我们的党和我国的共产主义事业遭到巨大的损害。此外，它还会大大加深整个劳工和进步运动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削弱各个方面的人民斗争。

让我们追溯一些最近的历史来证实这个意见。

多年以来，广泛阶层的加拿大人民对于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对大气层的毒化深深感到不安。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北半球的我国这个地区的盛行风，我国的核微粒特别浓密，使人更加不安。

广泛的运动

因此那些至少到那时候还没有参加任何其他反对准备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群众和组织就提出了要结束核试验的要求。

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们当中有许多完全不清楚世界上战争危

险的根源是什么。事实上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受到欺騙因而認為戰爭危險來自社会主义國家。

可是围绕着這個問題所展开的廣泛的運動，不管那些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的了解如何，實際上是走向制止世界上的那些想要繼續試驗和製造新的、更為恐怖的核武器的勢力——也就是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勢力。

此外，那些首先對禁止核試驗問題表現積極態度的許多人開始認識到有必要採取反對加拿大核軍備和要求廢除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的立場。在相當程度上，加拿大近三、四年內興起的爭取裁軍的新運動是起源於反對核試驗的鬥爭。

有原則的立場

如果加共一直奉行中國人所鼓吹的那條“總路線”，大概，我們就得譴責整個這一運動，說它在人民中助長危險的幻想，因為運動未揭露美帝國主義。

那樣我們就將竭力說服我們所能影響的每個人都不要同爭取禁試運動發生任何關係，並在勞工運動內積極地反對這個運動。

幸好我們沒有做這樣的事。我們不僅僅也是首先提醒放射性危險的人，而且還一貫努力鼓勵這個運動使人民在反對核試驗上達到最廣泛的團結，努力指出美國軍國主義者在阻撓禁止核試驗，努力說明在這個形勢的某一個階段蘇聯為什麼認為它有必要恢復試驗。這是一種廣泛的和有原則的立場。

現在部分禁試已經談判成功了，中國共產黨人却要我們譴責它是一個“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騙局”。

人們禁不住要問，一個通過停止放射性毒化可以使兒童免

于痛苦地死于骨癌的協議究竟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欺騙性？

中国人毫无证据的认为，人民将被愚弄得以为爭取和平的斗争現在已经胜利了。

与之相反，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将从部分禁試的即使是有限的胜利中得到新的勇气。爭取和平的工人們需要这样的胜利，这能使他們相信他們几年的努力已得到了成就。

加拿大許多支持和平运动的人在贊成要核武器的自由党人执政后感到沮丧，他們认为反对核武装加拿大的斗争已经最后失败了。

現在部分禁試的成就已表明出在包括制止核武器扩散問題在内的其他問題上有逐步达成協議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加拿大的核武器問題出現了新的情况，打开了扩大和加强这个斗争的新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要我們否认这一切并利用我們的影响在我国的和平运动中散布失敗主义。加拿大共产党将拒絕这个糟透了的主意。我們將利用禁試條約簽字的时机来竭尽努力帮助加紧进行反对核武器、反对我国領土上的外国基地和爭取全面彻底裁軍的斗争。

現在可能有人要問：“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也提出这些建議嗎？中国政府不是刚发表了一个‘主张全面、彻底、干淨、坚决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倡議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會議’的声明嗎”？

是的，中国政府确是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但是，他們并不相信它。三星期前在《加拿大論坛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人6月14日的信里，他們鄙夷地指責說“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軍’，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

切实际的幻想。”

包括中国党在内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在1960年签署了一项声明，声明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强大以及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但是要问的决定性问题是，这个协议是将导致和平还是导致战争。

丧失了的信心

中国人现在实际上是说，他们已经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接受裁军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换句话说，谈论裁军的确很不错，可是它实际上是一场没有指望的斗争。如果像这样事先就承认失败，没有一场斗争能取胜。中国人的立场除了破坏和削弱争取和平的斗争外，不能产生别的作用。

就我们而言，我们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经验，以及我们在多年冷战中的全部经验，都为加拿大共产党人证实了政治生活中如下这些事实：

我国人民已变得越来越关心热核战争的危险——他们有一切理由对它关心。这就导致了对和平共处主张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大多数加拿大人一直不了解而且到现在尚未了解战争危险来自帝国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到战争制造者的宣传的欺骗。

联合行动

共产党人的职责在于尽他们的一切力量同这种欺骗人民的行径作斗争。但是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我们决不能不看到同目前还不明白战争危险的根源的人民群众采取争取和平的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例如，在去年10月，成千上万加拿大人还不准备谴责肯尼迪或支持古巴革命，但是却相信决不能在古巴问题上发生战争。

尽管他们对战争的根本原因的了解有限，广大阶层的人民为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行动却是对要战争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有力障碍。争取和平的每一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的失败，不管参加取得这个胜利的那些人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个事实。

同时，人们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愈多，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对于为什么社会主义是谋求持久和平的，为什么发动战争的运动是帝国主义产生的道理也就知道得愈多。共产党帮助人民取得这些教训，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以其典范的、一贯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了尊敬，所以它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人劝我们玩弄热核战争危险，要我们欺骗人民向他们保证在一場核灾难之后“胜利的人民，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中国共产党人劝我们只去同那些能有意识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力量团结，这就意味着要否认同许多加拿大人建立团结的可能性，这些加拿大人还不了解帝国主义的作用，但是他们准备联合起来支持能导致裁军与和平共处的政策。

能够赢得和平

中国共产党人劝我們放弃这个觀念：爭取和平的斗争——这在我国是个最大一致的問題——为击败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計劃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

实际上，劝我們做的是放弃围绕一个关系到我們的国家和人民的实际生存的問題进行斗争。在一場热核战争之后，加拿大还会剩下誰来建設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些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建設社会主义呢？

因此不仅必須說爭取和平的斗争是爭取生存的斗争，而且还必須說这个斗争是能够贏得的。和平是可以强加于战争制造者的。这是我们根据我們在加拿大人民中工作所取得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使我們对于加拿大人民所具有的识别力以及对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見解所具有的识别力而得出的坚定信念。

加拿大共产党认为赢得和平共处是为我国向社会主义发展創造最有利的条件的手段。我們决不会脱离这条路线。

（譯自1963年8月19日《加拿大論壇報》）

讓我們把事情說清楚

《加拿大論壇報》編者的話

加拿大共产党和《加拿大論壇報》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們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見。我們已经尽最大努力和在我們報紙篇幅允許的範圍內設法向我們的讀者提供了關於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分歧的基本事實。

但是我們知道，這是不够的，我們的許多讀者希望知道更多的情况來帮助他們更好地、更完全地了解所涉及的爭論和問題。正因为如此，我們歡迎我們的讀者写來的要求回答問題或者要求更充分地解釋我們的意見的信件。我們將設法直接回答、或者利用《論壇報》的篇幅來回答這些信件。我們還要繼續刊登一些關於這個題目的文章。

* * *

但是，本报前两期刊登的關於這個題目的一些信件不屬於這一类。在我們看來，寫這些信的目的不是為了弄清楚情況，而是為了提倡或者支持一些政策，這些政策的作用將是妨礙團結一致爭取和平和裁減核軍備。雖然這些讀者完全有權利發表他們的意見，由於他們對本報的政策提出挑戰，而且有些人甚至對本報的正直態度表示懷疑，因此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對這些信件表示意見：

在我們看來，像安大略省漢密爾頓的佩西·萊蓋特（8月19日的《論壇報》）那樣把“和平共處”看作“姑息”的同義語是輕率的冒險主義。萊蓋特先生實際上說，俄國本來應該在古巴問題

上勇敢地同五角大楼对抗，如果这样做的話，“美國本来会撤走海軍陸战队”。我們要問，如果他們不撤，那么怎么办呢？萊蓋特先生在他的信中承认：“我以前从来沒有参加任何战争”。我們希望他永远不需要参加任何战争。但是我們要不揣冒昧地建議他向那些曾经參加过战争或者有亲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喪失生命的人提出他的冒战争的风险的建議，看看他們有什么意見。

在同一星期，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弗·姆·对我们的一篇社論提出异议，我們在这篇社論中說：“凡是切望和平和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人都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深感不安。”

我們仍然坚持这种意見。中国领导人后来的言論和行动只是再一次地证实了我們的看法。任何真正切望和平和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怎能不对只能导致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和导致最后发生热核战争的意見和政策感到不安呢？只有那些无视事實或者对战争的后果无动于衷的人才会滿不在乎。

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利思·麦墨萊(8月26日)从国际辯論中得出了既混乱而又使人糊塗的結論，但是他对中國共产党人提出的要他們如何“整頓”和改組他們的党的不必要而又不相宜的意見，既不会有助于消除分歧，也不会有助于澄清問題。

在同一期中，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弗·密契爾問我們为什么就中国人說过的話向我們的讀者“一味撒謊”。看来“撒謊”这个字眼的侮辱的意味显然还不够重，因此他又加上“一味”这个字眼，虽然他并沒有說明我們以前是怎样“撒謊”的。

但是他甚至沒有证明他的关于撒謊的論点。在引我們的8月12日的社論的时候，他又引了中國人的7月31日的声明来企图证明这是“有意說謊”。这两者当然是完全不相干的。

这正是中国领导人自己在目前的辯論中采取的不誠實的方法——說的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想的和做的完全相反——这

一切都使任何想了解真相的人感到失望。实际情况是，人們不能单单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說的話来判断他們，必須根据他們对他們的言論的解释和他們做的事来判断他們。

* * *

讓我們把事情說清楚：《加拿大論坛报》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中“不是中立的”。我們深信，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意見和政策是违反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即需要通过积极奉行和平共处政策来消除核战争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我們将利用一切机会揭露他們并同他們斗争。

（譯自1963年9月2日《加拿大論坛报》）

“稻草人”和“以暗諷进行裁判”

蒂姆·布克

中共中央在鼓吹同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的精神和文字都是矛盾的观点，这已是若干时候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中国同志們拚命向所有的国家宣传他們的这种說法：“有些党”正在奉行机会主义的路线，“有些人”是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他們不仅仅是向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宣传，而且还尽力用人类比較普遍使用的一切文字向所有国家中的所有阶层的人散发他們的材料。

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通过，在当时似乎是表明了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特別是草拟和签署这个宣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坚定团结。值得一提的是，参加那次會議的中国代表团是毛泽东率领的，他在會議上發揮了积极的作用。

令人难以相信

但是，尽管他們宣称同意莫斯科宣言，中国领导人却在1960年夏天展开了激烈反对莫斯科宣言的几个主要論点的論战，特別挑出“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論点加以激烈的攻击。他們在題名为《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的两本小册子中发表了他們的攻击。这些小册子已用最普遍使用的一切文字在所有的国家内散发。

这两本小册子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以及它們隨心所欲地斷章摘句并敘條地加以搬运，同莫斯科宣言的文字和精神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相违背到如此程度，以致使使人难以相信它們代表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经过考虑的意見。

在加拿大广泛分发这两本小册子的做法，客觀上是对加拿大共产党党纲的直接攻击。这特別是对我們在1952年2月正式通过的一个論点的攻击，我們的这个論点是說，假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对我們有利，只要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同它的民主的同盟軍在战斗性的人民民主行动中团结一致，在加拿大就可能不经过內战而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次公开的攻击

苏共二十大和莫斯科會議都贊同这种觀念，然而它却突然遭到了中国党的公开攻击。

正是因为我们加拿大党一向非常欽佩中国共产党，因此就有必要拒絕这两本小册子內所提出的論点并揭露它們的論据之錯誤。因此，加共全国执委会，通过当时加共总书记蒂姆·布克在《馬克思主义評論》中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加共执委会和加拿大党要同作为这两本小册子的主要內容的那些錯誤思想划清界限。

参加八十一个党的會議的中国代表团曾拼命想使大家接受两本小册中所鼓吹的觀点，但是會議坚决予以拒絕。然而，在几次紧张的會議上，当全体会議“作为一个全体委員会”逐段地拟定这个文件的时候，曾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在修訂會議結束的时候，中国代表們宣称他們认为声明是正确的，他們將同其他代表团一同签字。文件的通过似乎再次表

明了他們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沒有多久，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它的世界范围的宣传运动。然而，它的宣传現在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他們曾經試圖使之包括在八十一個党的声明之内但未得逞的那些思想仍然是他們的宣传中心，但是随着宣传运动的发展，这些思想变得不那么突出了，而且越来越不突出了。他們的文章和社論，甚至是党的正式声明，都貫穿了这样一种手法：硬把一些沒有任何共产党支持的目的和政策說成是“有些党”的目的和政策，然后斥責这些目的和政策并且以暗示的語氣說“有些党”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并以战斗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宣传“加以駁斥”。他們不直接說出他們的攻击对象的名字，而是臆想加上一个臆想、一个“如果”接着一个“如果”地制造出一个鼓吹錯誤理論、实行机会主义的或者更坏的政策的“稻草人”，他們硬說那就是“有些党”和“有些人”的面目。

“以暗諷”进行裁判

中国党中央委員會最近直到目前所散发的最精心策划的文件——它的6月14日給苏共的“信”（刊登在7月29日的《論坛报》上）——通篇貫穿着“用暗諷”进行裁判的手法。

这个文件并没有捍卫八十一個党的声明；甚至也沒有談論这个声明。这是一个反对派的纲領，借口“某些党”和“某些人”犯了政治罪行，現在必須采取行动来挽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免受这种罪行的后果的影响。

虽然这个文件是写給苏联共产党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却在送交文件的同时大加宣揚，包括用俄語广播了文件的全文。文件的內容、語調以及在苏共和中共双边討論沒有开始以前便向

全世界广为传播这一事实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为了帮助两党取得一致意見，而是为了使現存的分歧中的詞句更加尖刻并增添了其他的詞句。

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說来很不幸，中国领导人沒有明确說明他們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个文件中沒有說，在他們的几个文件中的其他任何文件中也沒有說。这个文件中像他們的所有文件一样，都貫穿着对其他党和“有些人”的含蓄的否定的批評。因为他們非常籠統地提出指責，实际上，大部分指責可以适用于对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表示毫不犹豫的支持的每一个党。

对各种問題、对实际上无區別地加在世界各国党身上的暗諷和指責进行这样的广播并不是寻求真理和諒解的做法，而是企图以散布怀疑和混乱的方法挑起分歧。文件所用的措詞是为了激起斗志昂揚的工人的感情冲动的反应，这些工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认识被中国领导人“打倒”的稻草人是捏造出来的，只是被一再重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的激烈措詞所深深打动，而不认识中国领导人一再重复的做法大多是乱敲敲开的大門。

在党与党之間的討論中采用这种方法是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論的精神和光荣传统的。即使采取这种做法真正是为了求得團結，由于它散播怀疑、不信任和混乱，这样做也是有害的。

但是这并不是为了实现團結而作的努力。这是一个蓄意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的企图。好像要說明这一点是肯定无疑似的，中国同志們在他們的6月14日的文件中暗示說，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它們所采取的政策因而“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他們的文件的另一部分（但是所指的是同一个稻草人），中国领导人說，“这样的党，就絕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絕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絕不可能完成

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简单说来，中国党中央委员会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再也不配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虽然它没有简单地这样说。

促使分裂

在制造所谓机会主义政策的稻草人以后，中国领袖们又暗示说，他们所编造的邪恶只有在“党内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代替”现在的领导的时候才能在许多党内得到纠正。关于它自己对这种促使宗派分裂的做法的态度，中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声称，它将“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人民一起”，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

中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在系统地使用诽谤性的暗讽，使之适用于每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的党的同时，还不时地对一个人提出措辞谨慎的暗讽和一般的指责，他们并不真实地说出他的姓名来，而是影射地说他把这样一些论点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国家，如果某些条件已经具备，就有可能不通过内战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的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最合理的基础”。

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带刺的暗讽的主要目标，许多假装是理论性的说法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下面就是这些说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某”一个国家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社会主

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團結的政策，而且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凡是讀到有这段話的那个文件的人都会知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指的是苏联。这在整个文件中是很明显的。

好像为了要保证沒有一个讀者会誤以为这种誹謗性的暗諷指的是南斯拉夫，文件指責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說法，并指責“某些人”企图使那个国家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

同样的手法

最近中国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联合声明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來誹謗个人。在使用中国領袖們经常使用的措辭来表明苏联共产党第一書記的同时，中国和新西兰的領袖們指責个別的人（他們沒有直接舉出姓名）閹割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他們自己不肯支持革命，还阻止他人支持革命，他們的行动像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別动队，帮助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他們削弱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破坏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如果有任何证据证明有理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員提出这样严重的指責，那就應該提出这种证据，明确地說出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名字。相反地，中国和新西兰的領袖們在一篇籠統的声明中提出指責，只注意表明他們誹謗性的暗諷的目标是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同时不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以便为他們自己留下一条小小的逃路。

（譯自1963年9月9日《加拿大論壇報》）

歪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

蒂姆·布克

我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一个迅速发生变化的时代。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領域中接近于占絕對优势。苏联人民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不断变化的情况要求我們不倦地注意研究新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新的任务和可能性。实际上每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态进展都在提醒我們歌德的这句得到列寧贊賞的話是多么睿智：

“我的朋友，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如果中共中央或全世界九十个馬列主义党中任何一党建議修正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或者重新考慮它的某些部分，这样一个建議将会馬上引起注意和进行集体的研究。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宣称他們忠于目前这个样子的八十一个党的声明，甚至在他們把根据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所制訂的政策称之为修正主义的政策时，他們还一再这样說。他們对于严正地根据八十一个党的声明而制定的政策进行的譴責，已经越来越快地从辯論滑向謾罵了。現在他們在6月14日的信件中竟然公开号召他們可能影响的任何人，起来组织派別反对和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党的领导。这是一种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做法，應該受到各地共产党人的有力的駁斥。

中國人是錯誤的

有人問，“要是中國領導人是正確的，那又怎麼辦？”回答是清楚而毫不含糊的：他們是不正確的。中國領導人決心在所有決定性的問題上同世界上大多數的黨作對，他們是錯誤的。

中共中央在它的6月14日的包括二十五點的文件中的第一點中寫道：

“中心的問題是，承認不承認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問題……”

“只有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只有堅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

這些話很對。任何共產黨人都不會不同意這些話；這正是世界各國共產黨所宣傳和爭取的。中共中央有條不紊地暗示，它在進行鬥爭要使“某些黨”，甚至是大多數的黨，認識到必須堅持我們的科學的世界—歷史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伟大十月革命開辟的共同道路，這種暗示是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他們亂敲敲開的大門的這一手法的例子。

但是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必然反對中國領導人在第二點中試圖提出的——我應當說“是騙人的”——的下一點，因為在這一點中，他們所說的同他們想要描述的現實情況是矛盾的。由於他們在提出第二點時顯得它好像是他們的二十五點綱領的實際來源，或者至少是二十五點綱領的基礎，因此我們把這一點全文引述如下：

“什麼是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呢？概括地說，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凡是看过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的人，或是现在願意去看一下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用的字眼并不是声明的概括——连声明的可以辨认的模样也不是。中共中央不提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中具有历史性突出意义的那些特点。没有必要补充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地不提这些特点，恰恰是因为他们力图把积极坚持这些特点称之为“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

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說，“用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的方式解决当代最重要問題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出現了”。它說，“我們时代最迫切的問題是战争与和平的問題”……“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別高的警惕。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

声明还說，“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沒有改变。但是，已经形成了能够粉碎它的侵略計劃的現實力量。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現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制服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各国共产党把爭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关键性的論点被忽略了

让我来提醒讀者，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就是在以上面所引的語句为基本內容的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上签了字的。沒有这些語

句所闡述的論點，聲明的政治性質就會和它現在這個樣子大大不同了。但是，中國黨的領導人在全世界散發的、冒充說是綜述了八十一個黨的聲明的那个文件的全文中却沒有提到這一關鍵性的論點。這不是中共中央在它的所謂摘要中忽略的八十一個黨的聲明的唯一特點；而且單單這一省略就足以說明他們的東西不是摘要，而是錯誤地解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1957和1960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所一致同意的政治路線。

中共中央並不滿足于在它的所謂摘要中省略若干關鍵性的論點，從而錯誤地解釋了八十一個黨的聲明，他們還在6月14日的文件中錯誤地解釋了這些論點。例如，他們粗暴地錯誤解釋“即使世界一部分地區仍存在着資本主義”情況下有可能防止世界大戰這一論點。中國領導人指責這一論點，說這是“純粹的幻想”。他們在包含二十五點的文件中以第十四點來說明這一論點：“某些人”（非常明顯是指蘇共第一書記）“却不願意稍微領會一下列寧關於戰爭問題所說的簡單明白的真理”。

他們拒絕和嘲笑當任何地方仍然存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就能從世界上排除戰爭這一觀點，他們寫道：“1960年聲明說得也很清楚：‘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將最終消除產生任何戰爭的社會原因和民族原因。’”

這是中國領導人所採用的手法中一個特別經不起推敲的例子。那一句話是直接從八十一個黨的聲明中摘引的，它在聲明中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中國黨領導人在他們的上下文中引用這句話時，實際上是用“原因”這個字來代替“戰爭”這個字。因為這種引用的方法，或者說是錯誤的引用方法是6月14日的文件的一大特點。我們引述八十一個黨的聲明的真正的說法：

聲明在指出“……如果帝國主義狂人發動戰爭，世界人民將清除和埋葬資本主義”之後繼續說道：

在这些条件下

“列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一切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日益广泛地表现出来。不久的未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苏联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取得新的胜利。殖民主义体系将完全崩溃，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将占绝对的优势。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这一段话的含义和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性的句子看来具有有的含义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不再需要加以评论。

然而，对于这个例子中所表明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区别有必要予以注意。一种态度是上段引自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的话所表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典型的范例；是要遵照不朽的列宁的“勇敢地预见未来”的遗训，运用我们的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点，不是把它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作为实现我们美好的前途所必需采取的行动的指南。另一种态度是狭隘地搬用这段鼓舞人心的话的结论语句的做法所表明的态度，它所使用的方法是随心所欲地摘引语句，而不

顧列寧提出的沒有絕對的邊界這樣一種不倦的警告，不顧他提出的把可能影響政治變化的一切因素考慮進去這種同樣是不倦的告誡，而這種隨心所欲地摘引語句是為了支持“這一點做不到”這樣武斷的說法。

根據書本的爭辯

中國黨的領導人搬用引語的做法以及他們的整個論證都帶有如此濃厚的教條主義味道，如此抽象，因而使人覺得這是“根據書本的爭辯”，而不是客觀研究和分析具體的現實情況。

中國領導人利用許多抽象的假設性問題和辦法，避免把他們自己關於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的鬥爭的觀點同八十一個黨的聲明直接對立起來，並且還“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面孔”，寫下他們自己的論斷：“因此，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錯誤的。”

但是，八十一個黨的聲明說：

“在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的情況下，國際關係中唯一正確的和明智的原則是和平共處的原則……

“是不同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還是破壊性戰爭——現在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和平是社會主義的忠實的同盟者，因為時間對社會主義有利，對資本主義不利。”顯然，中國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得出的結論是直接違背它所簽字、中國領導人声称他們仍然效忠的八十一個黨的聲明的。

（譯自1963年9月16日《加拿大論壇報》）

幻 想 对 现 实

萊斯利·莫里斯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画一幅当代世界的图画，但是这幅画是不现实的，而是充满了政治幻想的。

正如抽象派画家歪曲现实并用自己的幻想代替现实一样，中国人也歪曲了当代世界的现实，而且一味歪曲下去。

他们特别在战争或和平问题上这样做。

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幻想和谩骂（后者现在已经超过了正常讨论的界限）是由于苏联在1959年拒绝了他们要苏联提供原子武器的要求而感到生气。

只是在最近他们才说这件事。他们本来应该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出来的，假使那样做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详细讨论的，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时间，省很多话。

我们认为，苏联拒绝把“炸弹分给”中国是完全正确的。

当苏联承担社会主义的义务，尽力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以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原子弹力量的时候，它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各项互助条约，包括同人民中国签订的条约，都写上这条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巨 大 代 价

这个使世界和平有可能实现的巨大成就是对苏联人民的一个代价巨大的负担。如果他们当初不是必须这样做，他们今天

的生活水平会比現在实际的生活水平高得多。

苏联的核武器系統不仅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边界，而且是为了保护全体劳动人民，保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政权的。

的确，人們可以这样說，如果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武装力量，中国早就会遭到进攻，也許在朝鮮战争时期就遭到侵略。最近，古巴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必须重复发展一个原子武器系統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許使自己的经济破产呢？为什么中国在大家都了解其经济問題如此巨大的时候竟然要这样做呢？

如果把炸弹給中国，为什么不給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呢？中国人经常強調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

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扩大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意味着扩大世界軍备竞赛并带来战争。

中国在这个問題上所抱的幻想是带有民族形式的。由于民族威信、民族自豪和民族主义的原因，他們要求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系統。

他們把苏联表示願意支援中国和帮助保卫中国的建議斥为“大国沙文主义”！

这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十足庸俗的民族主义。

幻想起不了作用

因为中国人沒有自己的核武器系統，于是他們就反对部分禁試，詆毀它是騙局，是犯罪。

換句話說，为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世界人民的利益可以被撇开在一边。

当然，这种幻想起不了作用。到目前为止，已有七十七个国家在部分禁試條約上簽了字，中国的論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拒絕。

加拿大共产党怎么能一面反对美国的核弹放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一面却又支持苏联的氢弹放在中国的領土之上呢？

如果有人說，“怎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加拿大是資本主义国家”，那么，我們必須回答：氢弹既不是資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像天花一样是全球性的，而且必須像对待天花一样加以隔离和消灭。

而且，要是加拿大和中国都沒有这种炸弹，社会主义事业和进步将会得到推进而不是受到阻碍，因为，我們最后禁止了核武器和實現了裁軍，就可以在沒有軍备竞赛的情况下最好地取得进展。

和平和裁軍是社会主义最好的盟友。

中国人还在另一个方面陷于危险的幻想。

他們說，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斗争不是資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間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之间的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間的斗争；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取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个“主要斗争地区”的斗争的結果。

这是一幅异想天开的描绘世界的图画。

一个单一的进程

把世界分成这样的“地区”意味着把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

放革命分开，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单一的反帝革命的进程。

如果帝国主义不曾被苏联和新出現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所削弱，如果羅馬—希特勒—东京軸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未被击败，如果社会主义不會支持各殖民地人民，他們能够赢得自由嗎？当然不能。对中国革命來說也是这样，而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也正确地說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的继续。

不錯，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現在是帝国主义体系的最薄弱环节。但是，那不等于說，民族解放运动（不是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在社会变革中“居于领导地位”。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不是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一切事务的“枢纽”。

鉴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于其他各大洲人民所做的解释，这种提示就是鼓励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

例如，中国人說，共产党人必須领导殖民地的革命并說武装斗争是解决殖民地問題的主要手段。

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老的殖民主义体系几乎是支离破碎了。

在1917年，全世界77%的土地和69%的人口在殖民主义的桎梏之下；今天，全世界只有7.6%的土地和1.5%的人口仍在帝国主义統治之下。

跳过资本主义嗎？

自大战結束以来，有五十个国家获得政治独立。

其中有許多国家沒有共产党，沒有产业工人阶级。这些国家各不相同，有的是部落经济如赤道非洲，有的是拥有工业和现代工人阶级的国家。

他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他們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還是跳過這個階段而走向社會主義？他們將成為人民的經濟和社會需要能夠得到滿足的民族民主國家，還是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正試圖在“援助”的幌子下加在它們頭上的新殖民主義的新的犧牲品？

它們每年將繼續把二百億美元注入帝國主義者的金庫，還是把帝國主義企業收歸國有，貫徹實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建立國營企業並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

社 会 自 由

在這些國家的內部，各階級之間存在着政治鬥爭。這種鬥爭集中於這樣一個問題：他們究竟是要採取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的道路。

這個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是多年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經濟發展受到阻撓的各國人民面對的真正問題。

他們不僅希望獲得民族解放而且也希望獲得社會自由。

他們在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般地援助下可以實行工業化並在社會方面取得進步；如果他們依賴想要保留對政治上新獨立的國家的經濟控制的美國、英國和法國，它們就將停滯不前。

這就是他們遇到的真正的問題。這些國家的人民最終將不是單獨地或孤立地而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的密切友好的合作下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的責任就是要迫使他們的政府改變政策並且給予他們以真正的援助。例如，加拿大就能夠而且必須以工業裝備和長期貸款的形式來提供這種援助。

但是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所有这一切都仅仅看作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作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問題，这种看法将会破坏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间的民主团结。

他們认为这些国家不可能通过一种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罪恶的民族民主形式以取得和平进展，而鼓吹“左的”政策。

这些国家的经济問題是刺刀和游击战解决不了的。

在像南朝鲜和南越这些处于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一些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进行武装斗争争取自由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把这种情况說成“全球皆是”，那是幻想。地球上是有許多許多的国家的。

中国人硬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顧关心民族解放斗争，并且出卖它。这是不真实的；它的不真实就来自跟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那种别出心裁的幻想。

現在有正义的解放战争，在某些国家里这是走向自由的唯一道路。

这始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但是这并不是說战争必須是在一切情况中的手段。究竟采取什么行动方針，該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

这种幻想大部分是由于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了解肤浅。

例如，中国描绘世界革命过程是由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领导的，而把西方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降于次要地位，这同一些肤浅的概念是不无关系的，这些概念认为，革命性变革主要是由“落后”国家搞起来的，或者认为馬克思主义把“落后”抬高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根源。

想起一个故事

这使人想起一个关于列宁的故事，最近一位作家曾重述了这个故事。

大約四十年以前，布哈林說世界革命过程是从经济水平最低的地方开始，革命开始的速度跟資本主义成熟程度成反比。列寧糾正他說，革命过程从经济水平“并非最高”的地方开始，革命的速度同資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并不成正比”。

一个真实的世界就在那里，它是由世界本身的过去的情况和正在经历的情况所产生的并且得到证实的。

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个世界变化的时代实际上是多么复杂。在政治中，直线是达不到目的的。

（譯自1963年9月23日《加拿大論壇報》）

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

蒂姆·布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的6月14日文件的第十一点中攻击并辱骂它所称的“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

他們文件中多少有点勉强的論点表明，文件的作者想要在不公开违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情况下进行攻击是有困难的。他們說，他們攻击的对象犯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之罪，他违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結論，因而违背了馬克思主义。作者对爭取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了不遺余力的指責。

但作者在“爭論”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馬克思和列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們能够提出来和这一点相对抗的唯一的一段話就是下面这段使人感到惊奇的話：“事实上，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作者們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馬克思和列寧在他們的当年要求一切負責的革命者注意这一可能性时，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任何先例。他們沒有把我們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观点当作一种教条，来支持“这一点做不到”这种武断的說法，他們把它当作“冲天的”指南，实现当时的教条主义者宣称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来創造先例。

兩 手

文件的作者好像意识到他們的辱罵會使他們处于站不住脚的地位，因此他們在他們第十一点的結尾中試圖用下面这段以权威自居的話來打掩护：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須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

这些作者沒有告訴讀者，他們这样說实际上是引用赫魯曉夫的說法，他才是这个公式的制訂者；他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及許多其他場合中正是这样說的，而且內容和形式更为完整。莫斯科宣言、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及我們世界运动的許多文件中都表示了这一概念。他经常表示的正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中国文件中所暗示的歪曲事实的說法。

6月14日文件的作者告訴他們的讀者共产党对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那句話，事实上只不过是用他們自己的話把因为宣揚了这些話因而受到他們誣蔑的那位同志的話改說一下而已。

* * *

我們至今所談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党中央委員会是錯誤的，无论是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估計上还是在宣传它的觀点的方法上都是如此。但是，有必要再談談另外一个問題，因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这个問題上、即使光是在这个問題上是对的，那么我們加拿大党的纲領就将是錯誤的，因而中国领导人在所謂他們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而斗争的說法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有理由的。这个問題就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更高阶段、即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期的国家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今天苏联沒有资产阶级，而且任何希

望以内部行动来恢复资本主义的条件早就被消灭了。

苏共新的纲领规定了不断地、加快地前进，这样，在今后十八年内，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可以在苏联建立。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纲领时解释说，在苏联内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它的这一历史使命：击败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图谋和克服国内一切资产阶级的抵抗。

由于产业工人的组织和作用，他们继续是领导力量，但是从有计划地发展共产主义物质基础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再是必要的了。

由于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可能性，苏联的居民变成了由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劳动人民，国家成为全民国家，苏共成为全民的党。

中国党在6月14日发表的那个文件的作者们猛烈地攻击这一观点。他们指责苏共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接着问他们的读者：“这岂不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这种恶毒的含沙射影的攻击是针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列宁的党，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发的。

针对苏联国家现在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国家这一论断，他们针锋相对地举出了马克思的这番话：“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文件的作者知道，马克思之所以写这段话是为了驳斥

这样的理論：資本主义将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必用工人阶级国家力量，即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本主义国家力量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設。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分析在資本主义经济已经废除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经济以后，在任何资产阶级不再存在的时候国家仍然必须执行的社会职能。

赫魯曉夫同中国领导人采取的靜止的态度不一样，他在考慮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完成以后的前进道路。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在事先規定，为了适合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需要，国家的变化究竟将采取什么正确的形式，这种形式将由国家必须继续执行的职能来决定。正如列宁在直接提到社会主义革命后国家发展的問題时指出的：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問題呢？……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資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資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資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結果。”（着重处〔中文用仿宋体〕是列宁加的——蒂·布）

列宁像馬克思一样，在实践中一貫采取唯物主义辩证法。他决不是凭空設想的烏托邦；他也从不认为，一个科学的无可爭辯地正确論断会限制发展。6月14日的文件的作者用的某些引語实际上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的精神的。例如，他們引了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中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話：

“在資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中国党领导人在利用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論断时把它当

作一种机械的教条，而不是像馬克思闡明这一論断时那样辩证地作为对行动的有力指針，他們从而混淆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形式和內容，混淆了工人阶级对社会领导作用的形式和內容。

錯誤的解釋

他們把馬克思在写《哥达纲領批判》时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解释成为这种意思：社会主义民主将会发展，最后将发扬光大，而它的形式却始終不变；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最高保证而建立之日起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中国领导人即使仅仅根据他們自己的经验也应当知道，生活并不是，也不可能那样发展的。他們所提到的变化是指从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克服反革命资本家妄图进行抵抗，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社会主义经济等等的企图而建立的国家的形式开始，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成熟到不需要任何国家的组织之时为止所发生的变化。国家不可能好像在一夜之間就经历过这一伟大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它們必須成长起来，它們的公民必須在爭取这种变革的时候使自己得到发展。

列宁在他的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談到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国家演进的問題，但是他論述这个問題的方式同6月14日文件的作者有很大不同。列宁写道，“……馬克思甚至談到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国家，这就是說，仿佛他认为，甚至在共产主义之下还需要有国家。”

6月14日文件的作者提到苏联这个作为全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时写道：“这岂不是从根本上同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說相抵触？”

忽視列寧的研究

我們完全有理由請問這一文件的作者：你們的意思是不是說馬克思也同馬克思主義，列寧也同馬克思主義是相抵触的嗎？因为列寧当然也認為國家的消亡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他寫道：

“因此，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着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它的長短將取決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至於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只能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個問題的材料。”

列寧為了闡明上面所引證的論點，還進一步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下，在一定的時期內，可能需要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6月14日文件的作者，故意忽視列寧關於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向着先是大多數然後是全體居民毫無例外地執行國家的職能的水平的發展過程中，決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向全民國家發展的條件所進行的精辟研究。文件的作者避而不談這一點，表明他們認識到，列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論述，駁斥了他們據以激烈攻擊蘇聯國家今天作為蘇聯全民國家這一點的論據。蘇聯共產黨正使馬克思和列寧的科學向前發展。

（譯自1963年9月30日《加拿大論壇報》）

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錯誤

蒂姆·布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从来没有向它的讀者說明它为什么坚持要毫不考慮后果地企图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因此，人們紛紛揣測，特別是猜測他們主觀上可能抱有的种种动机。

暫且不提所有这些猜測，也不去理会主觀动机的問題，但是有必要着重談談在中国党領導成員的发言中明显可以看出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是的，而且是向所有善意的人們——提出挑战。

有人借口說，中国党和亚非人民以及只不过在略小的程度上和拉丁美洲人民，有着一种同所有其他共产党无关的特殊的共同利益，这种說法强烈地暗示这种共同利益反对中国领导人諷刺地称之为“优等民族”中的那些共产党。

要分裂人民

从6月14日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明显例证。文件的作者在第八点中写道：“有人……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維持統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論’。实际上，这种‘理論’，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維持所謂‘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統

治”。

这一段話表明中国共产党領袖公然企图把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正当的合理的憎恨轉为对其他共产党的憎恨。

这种不道德的宣传跟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这种宣传得逞，它将使世界人民分裂；也許在一整代的时间內分裂。

除了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破坏影响外，它只会損害各地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为正同中国党的口实相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力量对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最后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刘少奇同志向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明了为这种动机寻找理論上的“理由”的想法。据斯特朗对那次談話的报道，刘少奇同志說：“馬克思和列寧是欧洲人，他們用欧洲的語文写欧洲的历史和欧洲的問題，难得触及亚洲和中国。”刘少奇說，另一方面，“毛澤东不仅把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条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他已经創造了鮮明的中国形式或亚洲形式的馬克思主义。”

“亚洲的馬克思主义”

这种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这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科学現在为一种鲜明的“中国或亚洲的馬克思主义”所超越的看法是令人惊讶的；特別是这竟出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之口，这就更令人惊讶了。但是它的主要政治內容并不是新的。多年来在毛澤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里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中国党的官方刊物《紅旗》在社論中表示这种看法时用了这段話：“我們完全有权利說，毛澤东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設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如果我們提醒《紅旗》的主編，“社会主义革命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毛澤東同志開始寫作以前就有人闡述了，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是在蘇聯發展的，它的規律是在蘇聯展現出來的，在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列寧的黨領導下的蘇聯人民現在正在建設共产主義的物質基礎；我們這樣說決不是想貶低毛澤東同志或是縮小他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的歷史性作用。

要是劉少奇同志所說的亞洲的共产主義是同循着1960年的小冊子《在列寧主義的旗帜下》和《列寧主義萬歲》中所提出的路線而發表的黨的聲明、信件、社論和文章所陳述的觀點和論據以及語調一致的話，那麼，必須毫不含糊地說，這是從八十一個黨的聲明中所規定的路線上大大後退了一步。

那個文件是完全根據承認今天政治發展的主要內容是從資本主義向社会主义過渡這一事實，承認兩種制度之間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社会主义世界體系正在取得勝利，正在接近于在社會活動的一切方面占決定性的優勢。

八十一個黨的聲明承認我們正處在一个新時代這一事實，指出社会主义世界體系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的主要源泉，並規定了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工人階級內在政治上的先進成員在同全世界的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力量結成聯盟的情況下所必須擔負的任務。

論點遭到拒絕

中國黨的中央委員會並不接受八十一個黨的聲明關於新時代的主要特徵的這一論點。與此相一致，它也不接受關於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世界體系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的論斷。

他們在 6 月 14 日的反对纲領中反对这一論点，指出了好几个其他的矛盾，并且說这些矛盾全都是基本的矛盾，也就是說这些矛盾是同等的。他們在这种基础上宣称：

“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之間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內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

6 月 14 日文件的作者运用新聞記者的巧妙手法，在不公开反駁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的情况下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今天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体系的矛盾。然而，必須指出，他們同时也表示不同意列寧的著名提法：共产党人“必須能够……找到人們应当尽力掌握的一連串事务中的特殊环节以便控制整个事务，并为过渡到下一环节进行长期的准备……”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拒絕了列寧的教訓，因为如果他們承认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体系之間的矛盾，他們就将沒有絲毫根据来宣传那种把民族解放斗争当作关键任务的論点。

但是不論是运用新聞記者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手法，都无法改变現實。它无法阻止甚至延緩社会主义向着在世界政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它无法阻止甚至延緩帝国主义危机加深和衰亡、老的殖民帝国崩溃、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力量空前地壮大起来。

斗争的关键

在这种发生暴风驟雨般的进展和具有各种新的可能性的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却要求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包

括三分之一人类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以前、社会主义早日負起世界领导这种前景具体地出現以前那个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武器和口号来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

这就是他們下面这一企图的必然結果；他們企图不让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认识这个事实——今天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之間的矛盾，因此这种矛盾是爭取实现社会变革的斗争的关键。

由于中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接受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体系之間的矛盾这个論点，因此他們就无法理解世界爭取和平斗争的新的、客观的内容。

他們在談到人类世世代代所渴望的和平的时候，好像和平主义是其中唯一的因素。他們把所有国家亿万男女由于害怕而不願看到世界性核大战的前景看成是这些男女仅仅想要逃避斗争，或者是有意识地从斗争中退却。

結束一切战争

中国领导人完全沒有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在构成現代政治的特征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間的新的关系中，世界范围内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具有强大的民主的潜力的。

由于战争危险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而保持和平将是帝国主义“核狂人”的巨大失败，人們在认识到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以后将会立即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范围内爭取和平的斗争具有强大的、实际上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领导人无视列宁喜欢引用的一句銘言“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中所說的这样一句話的重大意义：“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

会主义有利，对资本主义不利。”

为了人类真正的利益，为了体现民主的人民大众渴望和平的願望的这个伟大的世界运动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为了結束一切战争，为了迅速地推进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資本主义，各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为加强我們的世界性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所持的錯誤立場。

(譯自1963年10月14日《加拿大論壇報》)

加拿大共产党认为需要召开世界性會議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为了对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所通过的声明中包含的、而现在受到中国共产党领袖猛烈攻击的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政策表示最广泛的支持并在这項政策周围團結一致，現在举行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是必要的”。

这是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上周发表的一項公开声明中所表示的意見。

這項声明說：“我們党在若干时间以前曾建議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但是鉴于中国领导人违反取得一致協議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而进行的宗派分裂活动，鉴于他們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取得一致協議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斗争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时所使用的方法，我們认为必須尽快举行这次會議。”

“召开这样一次會議将有助于进一步純化和动员致力于和平和民主的各种力量。

“我們希望，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以及在會議上表現大多数党團結在1960年會議所通過的原則和政策的周围，这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员发生影响，促使他們重新考慮他們目前的政策，讓他們听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呼声，从而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

(譯自1963年10月14日《加拿大論壇報》)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決議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會議
(1963年11月15日至18日)

全国委员会會議再次重申它支持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所表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們党的纲領同这个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

从那时以来的事态发展，充分地表明了宣言和声明的有效性和力量。

我們党在各种不同的場合（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會議，以及党的代表团同苏共和中共會談）已经說明了自己对于在最近期間變得愈益尖銳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分歧問題的意見。

中共領導在假革命的詞句掩飾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其目的在于把它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方針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它进行了一个旨在破坏苏联、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誉的誹謗运动。

中共以它的行动严重地損害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借口下，从事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擅行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竭力使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割裂和孤立开来，并使它自己在爭取和平、和平共处和裁軍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进行经济合作政策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割裂开来。正是这种经济合作将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经济領域中最成功地同资本主义进行竞赛，并因而最有效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

人阶级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由于把美帝国主义及其原子弹說成是“紙老虎”，把爭取活命和反对核战争的斗争說成是怯懦，中国共产党表明它不了解世界核战争的性质，并低估团结人类的大多数为保存生命而反对核战争的可能性。

由于以和平共处排斥并妨碍革命斗争为借口，錯誤地把問題說成是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的对抗，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否认在現时代爭取和平、裁軍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它贬低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和它的革命潜力。在下述的意义上它机械地把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分割开来：在今天的条件下，爭取和平的斗争为遏制帝国主义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最有利的机会，促进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且鼓励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反对垄断資本的斗争，从而扩大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的社会基础。在今天已有足以使人类全部遭受毁灭的热核武器的条件之下，爭取和平的斗争便成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正是这种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共产党所否认。

由于宣称只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被消灭以后，才有可能出現一个沒有战争的世界；和平还是战争的問題由帝国主义国家的參謀长决定，中国共产党公开反对1957年和1960年世界各国共产党會議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論点，并且实际上是否认一場世界大战能够避免，因为在世界舞台上出現了新的反战和反帝力量，这些力量如果团结一致，就能迫使战争制造者接受和平这一論断。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称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已经轉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帝国主义将在那里被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就会得到解放，这实际上是否认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

义国家体系在击败帝国主义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指责我们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为改良主义和怯懦，并把争取实现民主目标、争取实现劳动人民当前的经济需要、尤其是争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不重要的事情，或者充其量只是策略口号。中国共产党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声称争取和平的斗争使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种态度阻止真正有效的反对（列宁说的“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使我们党脱离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完全拒绝的全然是玩弄假革命词句的另一个例子。

在关于和平与战争、争取和平共处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打算以主张输出革命的政策来代替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等問題上，中国共产党采取同我們党和我党纲領的立場相对抗的立場。

这里牵涉到的不只是对1957年和1960年两个世界文献的解释問題，而且是提出另一条以对当前世界各种現象的完全不同的估計和不同的結論为依据的路线問題。这些分歧是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錯誤政策的必然結果，已经在加勒比海危机、解决边境冲突和部分禁試條約等問題上得到具体表現。它們构成对于通过談判和互相妥协来解决分歧的努力的一种怠工破坏，正如它們构成对于争取和平和裁軍的具体斗争方式的一种怠工破坏一样。它們削弱全世界的和平阵线，因而帮助了帝国主义。

总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表現为一条民族主义的路线，一条教条主义的路线，一条冒险主义的路线，如果它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的基础，就会对和平事业、民族解放运动、資本主义世界範圍内阶级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法估計的損害。实际上，它是一条用假革命詞句掩盖起来、漠視当前

时代由于世界范围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而出现的新的可能性的失败主义和退却的路线。

对我们的党，也如对资本主义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策将对劳动人民群众关门；而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争取和平、民主、独立或社会主义的斗争。

此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再一次肯定它的有原则的、不可改变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会议赞同1963年10月3日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下述事情的声明：号召全党加强和扩大工作，以启发一切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们，务使他们清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所固有的混乱和鼓励分裂的思想；要求召开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结集在1957年和1960年文件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下，以便击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我们敦促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以便为召开这样一次世界会议创造适当的气氛。

共产主义、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高兴得太早，以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不可调和，不能解决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远离事实的。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不是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对世界现象采取主观主义的、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观点而产生的。正因为分歧的性质是主观性的，所以它们可以、并且将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57年和1960年文件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稳固基础上得到解决。

全国委员会声明：像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样，我们党将耐心坚持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和巩固在坚实的、有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原文摘要载1963年11月25日《加拿大论坛报》。
本篇是全文，根据加共文件译出）

“左傾”小資產階級絕望的哲學

萊斯利·莫里斯

“誰要是指望有一个‘純粹的’社会革命，他活着是永远也看不到的。这种人口头上談革命，却不懂得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列寧選集》英文版第4卷第303頁)

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人在对所有其他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建議时，大大自命为是忠于列寧的學說的。为了弄清真理，这种說法是值得研究的。

从差不多一个世紀以前的布朗基主义者一直到現在(无疑，将来也会如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个复杂过程中是充满着“左派”的禍害的。它是資产阶级唯心主义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政治中所发生的影响，它的表現是以主观的願望代替現實；于是它就产生了一种觀念，认为是思想而不是人創造了历史，夸大个別人物的作用、否定妥协、飞揚浮躁，資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顾人民群众而一味主张“包办的”、“煽动的”革命，終于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左派”使得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这种从資产阶级的传统和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更加长期存在的危险的斗争难于进行，因为它经常喜欢使用的詭計就是把所有在斗争中努力去把握新的因素和不肯做“左派”微妙的奸計的牺牲品的人們，都說成是“机会主义者”。

“左派”拒絕客觀地研究一些新的現象，拒絕創造性地发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的名义下把这一切都譴責為“修正主義”（正像列寧的新思想当年也被說成是“修正主义”一样）。“左派”总是打着最鮮明的旗帜的。

最后，它終于和民族主义摻和在一起了。現代的共产主义“左派”的代表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立場（这种立場同古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不是沒有联系的）出发，曾经在某个时期一直企图把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結合”起来，这不是偶然的。“結合”这个字眼儿是怪有意思的。誰同誰結合，什么东西同什么东西結合呢？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試圖把中国“結合到”馬克思列寧主义“中去”，这就产生了奇怪的結果。

“結合”不是列寧的关于使用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变革的武器的概念。列寧用的字眼是“应用”。

列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反对“左派”空論家时批評英國共产党人說：

“……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須保持自己学說的純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它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頓，不轉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則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这番話不禁令人想起中国领导人的文章！——萊·莫），那末他在这个問題上必然要犯錯誤。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則无非是重复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們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間站所犯的錯誤。第二、毫无疑义，在这个問題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則应用（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我标的一——萊·莫）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們應該善于研究、探求和猜透

这种特点。”（《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页）

現在不妨把上述这段話和劉少奇同志在1946年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作一番比較：

“毛澤東的伟大成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从欧洲的形式变成了亚洲的形式。馬克思和列寧都是欧洲人；他們使用欧洲的語文写了关于欧洲的历史和問題的文章，很少談到亚洲或中国。（但是馬克思写过不少关于印度的文章。——萊·莫）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无疑地是适用于（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我标的一——萊·莫）所有的国家的，但是把它們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是一項艰巨的任务。毛澤東……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問題。他是第一个作到这一点的人……在每一种問題上——民族、农民、战略、建党、文学和文化、軍事、財政和经济、工作方法、哲学——毛不仅把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情况中去，而且还使它得到了新的发展。他創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或亚洲式的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的广大人民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耕种着小块的土地。它的经济是落后、分散的农业经济。中国要想向工业化程度較高的经济过渡，就遇到了工业发达国家的竞争和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这种基本情况既影响着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又影响着像爭取民族独立和爭取中国人过着更加美好、更加自由的生活这种目标所要采取的斗争方法。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对所有这些国家发生影响。”（埃德加·史諾在《大河彼岸》〔1961年紐約版第651页〕中引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思想》〔《美亚杂志》1947年6月〕。）

（这次談話曾用中文发表，中国领导人并未提出异议。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一些討論中提出了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主张。)

后来，刘少奇所用的“适用”一词就变成为“结合”了。因此，我們就在中国共产党于去年6月14日致苏共的信件中为其他各共产党提出的二十五点纲领的第三点中讀到这样一段：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把这一段同各国党的1961年的声明中的說法，“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独立的、平等的，它們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制訂（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萊·莫标的）政策，并且互相支持”做一个比較。这在1957年宣言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那个宣言用的字眼是“結合”而不是“制訂”。

中国领导人由于錯誤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理的方法，因而对于政治采取了唯心主义的、过于简单的和行不通的态度，作为这种态度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通过“結合的原則”一下子就掉进了民族主义中去了，他們还形成了一种世界革命過程的新理論，根据这种新理論，被“亚洲的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中国特点，就成了所有其他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的特点，而这些国家（非无产阶级的农民国家！）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

列宁写道，“左派”只要离开寻找走向胜利的最直捷和最迅速的道路的真理而向否定机动和妥协的錯誤迈进“一小步”，就会使真理变成为錯誤。

列宁写道，政治与其說象算术，不如說象代数，与其說象初等数学，不如說象高等数学。一个人可能会这样想，列宁在提出这个輝煌的論点时，正是描写今天的“左派”。列宁曾描写“学识渊博的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和奧托·鮑威尔如何在学

面上充分地认识到需要策略上灵活和熟悉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在十月革命的考验到来时，却不能应用他們自己的学說而变成僵硬的非辩证的和反苏的，他写道：

“他們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个形式，而忘記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于客觀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說象算术，不如說象代数，与其說象初等数学，不如說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滿了新內容，因此在数字左边，出現了一个新符号即‘負’号，可是我們这班聰明角色却还继续固执地向自己和別人担保說，‘負三’大于‘負二’。”（《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頁）

列寧在这里，指的是那些看不到十月革命的新性质的右傾机会主义者，因为它不符合他們的先入为主的成見。但是“左傾”宗派主义的方法論是同右傾机会主义的方法論一模一样：看不到新性质，也不能“了解、研究、探求、推測”向共产主义客觀发展的特点。“左派”共产主义者犯的是同右傾机会主义者一样的錯誤，照列寧的說法，不过是“另一方面犯的”罢了。結果，他們——“左派”和右派，不謀而合，中国领导人的“左傾”教条主义之迅速轉变为公开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并在客觀上同和平共处的反对者合流就是证明。

中国领导人首先用一些响亮的、美丽的詞藻談到“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和“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又宣称，“片面地”強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任务和背离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革命学說”（1963年6月14日的信）；而結果却把他們自己放在和

“預防性戰爭”的鼓吹者同一个陣營里。这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虛偽的作法，他們曾經反对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贊成“革命的戰爭”，他們反对1921年的新經濟政策，并在苏联竭其全部資源修建第一座巨大的、近代化的第聶伯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却带煽动性的口吻要求一次修建五个而不是一个那样的水电站。

要不是苏共战胜了这种冒险主义、这种顛倒的民族主义，苏联就不会存在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現在也就不会存在。

中国领导人自命为精通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确，在他們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几次他們表现了最大的革命灵活性，但是人們未免奇怪，他們的革命詞藻如何经受得住他們自己的实践的考验。人們认为那些詞藻是经受不住的。贩卖革命詞藻、从唯心主义出发把复杂的斗争加以简单化，最終将会导致自我暴露和退却。

用鼓吹“亚洲的馬克思主义”的手段試圖使中国脱离单一的世界革命进程必将以失敗而告終。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中国领导人的理論則是非常蒼白的。

自从列宁总结了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并把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当前任务上去从而消灭掉“左派”的阴魂以来，已经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然而，由于列宁直到最終一直是馬克思主义的辯证家和现实主义者，所以他并不是抱着仅仅凭着几本小册子就能把“左派”共产主义消灭掉的幻想而进行工作的。

列寧說，俄国“实际上是经过痛苦”才获得馬克思主义的。他說，“小資产阶级革命主义”能够轉变成为“空想”，这在工人阶级很小而又不发展的农民国家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現象。它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气味，并且“在一切主要方面同持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不同”。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

所有这些歪曲进行过顽强的斗争。

这些国家内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深刻地和经常地注意到这种从环境中十分客觀地产生出来的危险；如果承认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那么这种危险就可以避免。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通过惨痛的和有原則的斗争以及丰富的经验曾经避免了这种危险。

中国领导人如果了解这一点，他們現在便是把它忘掉了。他們可能是在口头上承认这种危险。但是，馬克思主义，甚至在这里，在各国共产党的实践中，也要求完全不犯主觀主义，正如列宁曾经警告过一样，而承认这种事实：“……革命党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絲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錯誤，这种錯誤往往会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什么意外的原因而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見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見的裝扮，重新表現出来。”（《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頁）換句話說，經常保持警惕和進行批評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领导人的6月14日的信件是他們的纲領性的文件，所有他們的其他信件、发言、文章，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国党的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上的签字，只不过是这一文件的序曲；現在中国领导人已经担负起制定指导所有共产党的新的总原則的責任（其本身就是一种非馬克思主义的行动），从他們6月14日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他們这样做，并不真正懂得列寧主义，而他們現在却自命是列寧主义的主要信徒。

我們在上边提到自从列寧运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清楚地指出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已经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了，可是現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却如此简单。

列寧1916年在論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

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的一系列的戰鬥，這些戰鬥只有採取剝奪資產階級的手段才能完成。”（《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8頁）

1918年，當饑餓突然襲擊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時，不可避免地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在重重的困難面前日益感到恐慌，列寧說：“我們決不掩蓋和粉飾這一點，也決不用似乎是左的詞句和想法來迴避這一點。是的，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並沒有一道萬里長城。革命爆發的時候，情形並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只要把死屍抬出去就完事了。舊社會灭亡的時候，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世界上任何偉大的革命都不可能不是這樣。”（《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頁）

不妨把這種論理方法和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五點綱領中的“革命主義”做一個比較。其實，中國領導人在實踐中是完全了解列寧這番話的真理的，他們自己的對於中國資本家的政策就是明證，這些資本家接受人民共和國，並且得到保證可以拿到利潤。那麼，為什麼自己是一個做法，而別人就必須是另一個做法呢？為什麼對自己是一套原則，對別人是另一套原則呢？

他們總是滿口革命詞藻；他們脫離了實際。英國古話說得好，花言巧語是不中用的。但是，他們所能造成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

“左領”其實是具體的批判分析和具體的自我批評的一種代替品。它是對黨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否定，因為它用輝煌的詞藻代替了具體的研究。它是小資產階級絕望的哲學；它向困難投降，因為它否定困難，正像列寧生動地描述的那樣，看不到革命過程的複雜性和曲折性，而這正是革命過程的一般前

进方向的真正形式。它以直线代替革命的斗争、以观念代替群众；而且在这些意义上，它使革命的进程倒退，它迷惑人民，并且由于阻碍革命变革的发展速度，不是走向响亮地宣告胜利，而是走向挫折和失败。

这就是列宁提出的警告的精神和内容，中国同志們显然还没有学习过，也没有记住。因此，读到他們文件中的那些他們自称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令人作呕和妄自尊大的狂言，实在令人觉得有点好笑。献身是不够的，实践才是决定性的。

那些十分重視自己对辩证矛盾的过程的了解，并写了不少关于矛盾的书的人，不妨分析一下他們自己的矛盾——尤其是言行之間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給人民带来胜利所必需的灵活性（包括在西安释放蒋介石一事在内）和他們自己的理論概念之間的矛盾。

批评就像布施一样，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

要是中国领导人的目前的这些理論拿来作为对内或对外事务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会通过它的社会主义阶段，因而也就不不会完成那个阶段。

拒絕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实际上拒绝在苏联援助下使中国以最高的速度工业化的作法，两者加在一起就会构成一种失败而不是胜利的左倾政策。

而且，把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暗中（尽管中国同志們小心翼翼地不直截了当地說出这一点）交到革命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手里，并且否定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这个体系的存在在世界事务中日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事实，姑且不談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

阶级的作用这一点，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拒绝新的胜利。这是一个绝望的纲领，它已经把中国领导人引上反苏的立场，正像当年托洛茨基所作的那样。

因此，可以看出“左倾”实际上就是孤立和分裂主义的政策，不是国际主义和团结的政策。正像托洛茨基主义如果不被击败，就会是一种导致苏维埃共和国走向孤立终至失败的政策那样，现代中国型的“左倾”（由于中国的庞大因而显得更加厉害）也要导致孤立，并且不单要给中国带来挫折，而且还要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工人运动和新独立的国家以及仍然是附属国中的群众带来挫折。

只要稍一开头使真理变成了错误，正像列宁所警告的那样，最初采取的几个小小的错误的步骤确实就足以引导走向这种极端。

“左派”总是要发展一种同形式逻辑相类似的自己的独特“风格”，一种属于政治算术的风格，而不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政治代数的风格。这可以从中国领导人企图把自己的“左倾主义”的思想强加于苏共和苏共的纲领并想以一种积极的宗派方式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看得出来。他们完全脱离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的历史角度任意盗用他们的言论，并且得意地不看时间、地点和条件，更不用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了，于是他们悍然地提出了关于国家、民主，以及领袖个人和党的作用的最离奇的思想；实际上，这些思想正引导他们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把工人运动从中拯救出来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去。例如，他们把刑事犯罪分子同社会的阶级混为一谈，这就使人想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以阶级的观点而是以“道德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而这种观点正是出自那些指责其他党抛弃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口。

“左派”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过程正是疾病自然发展的过程。它像麻疹一样地蔓延起来。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从“亚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抽象的概念，从在世界性會議上同其他党質辯、爭論走向公开攻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党攻击另一个党，而是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这就是主观主义这种疾病领导一个政治有机体的地方。离开历史的现实，离开发展的理論，就会掉进主观主义的泥坑。中国领导人在这里应当再一次記取列寧的忠告：

“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損害，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以維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謬絕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謬絕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列寧曾经提到空論家的脱离常軌的情况——萊·莫），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謬絕伦的东西。”（《列寧全集》第31卷，1960年版第44頁）

中国党的6月14日的那封纲領性的信件里，从头到尾貫穿着夸张、过火、主观主义的激怒和疯狂的攻击以及企图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便推行自己的主张等手法。

中国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悍然不顾各国共产党各自的纲領中和世界共产党會議的宣言和声明中众所周知的相反的证据，依然坚持以下的論点：

——主张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等于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內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是每个共产党都坚决不同意这一点。

——因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抱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就随心所欲地把“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轉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他們并没有提出任

何证明和客观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这纯粹是一种主观的反应，不过从其特点来说它幸好没有反映现实——现实是，不管中国领导人说什么，风暴的中心存在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能设想它是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的。

——6月14日的信件为了急于替革命的中心已从国际工人阶级转移到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这一点“辩解”，它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以种种特质，这些特质有许多是他们现在还不具备的：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6月14日的信件中的第八点和第九点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相信的天真的论点，他们在说完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斜体字〔中文用仿宋字〕是我标的——莱·莫）这段话以后，提倡一种足以分裂新独立国家中以及尚须有待争取政治独立的国家中统一战线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政策。中国领导人随心所欲地不顾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即已取得政治独立这一事实，并且又随心所欲地把这些国家同最近才取得政治独立或有待争取政治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混为一谈，他们跳过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整个时期，却在他们6月的信件中把这些事情说成这样：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但这是完完全全、地地道道地贩卖词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着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国家”，从像阿根廷和巴西这样拥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那些非洲国家；从赢得了独立并且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面对

着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任务到已经拥有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又拥有大量地主制残余的国家；从像加納这样一些不是处于美国或英国的直接控制下的国家到那些政治上独立但美国在那里有着大量投资的国家（像委內瑞拉、加拿大）。不仅如此，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都已赢得了他们的政治独立，他们共有五十多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暗示說，目前反帝革命阶段需要有由（往往还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完全全行不通的“左倾”。这也許是中国同志們的文章中不合論理的、主观主义的蠱惑人心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附帶地說一句，它也否定了中国革命本身的过去和現在的经验。到处給朋友們开药方子，但却不給自己开！

典型的“左派”共产主义就是讲抽象，不讲具体，从中国人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規定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論的衣鉢。就拿“妥协”举例來說。中国的发言人“一般”是贊成妥协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反对妥协，这是贩卖詞藻、玩弄文字的最好的例证。事实上存在着許多的妥协，正像中国的领导人从他們的过去和現在的实践中是充分地了解到的，因为他們在必要时表現出他們是精于此道的。

因此，中国人就不能采取一种一般拒絕妥协的立場，因为他們自己的历史就要和他們发生矛盾，而且那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

当然，一般地贊成妥协是比较容易做的。但是对于具体情况下的妥协又采取什么态度呢？

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原則的。如果一种妥协保卫了资产阶级，加强了资产阶级，使工人阶级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战斗能力，这不是妥协，而是背叛。

如果一种妥协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给工人阶级以喘息机会来加强它的力量，而且如果采取不妥协的途径反而可能削弱工人阶级并且加强了资本家，那么这种妥协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如果不达成妥协，就将是对这种事业的背叛。任何进行罢工的工人认为这一点是个基本的常识。

中国人说，把和平共处当作工人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是背叛。但是，不和平共处就是热核战争。拒绝和平共处的积极政策，排除工人阶级在其自己的（除了战争以外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取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用列宁的话说，这不仅是“幼稚”，而且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中国同志们在这里所坚持的立场是最脆弱的，因此从其特色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的脆弱，他们在这一点上言过其实、夸大其辞才达到了最疯狂的程度。

冷漠地谈到热核战毁灭掉一半人口的可能性，无疑地这是出于资产阶级唯心论所固有的残忍性的硬硬梆梆的例证。唯心主义的诗人这样歌唱，“一切为了爱情，把世界整个毁掉也在所不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久经罢工的战斗，并从亲身体验中懂得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他们并不是为暴力而暴力的拥护者，他们也不必一定做了党员才来反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热核理论。中国的领导人听一听西方普通人民的意见，也听一听殖民地国家和新独立国家中的人民的意见——就是中国的领导人自以为自己要比这些国家的革命家更能真实地代表他们发言的那些人的意见，将是明智的。就一个以自己的群众路线而感到自豪的党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却做得非常不够，也许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也是如此。

西方的群众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群众就像他们现

在这样——他們正在采取行动，他們在实行革命。他們不是奉行諭旨、奉行中國人6月14日信件中充斥着的“最高級的指示”的臣民。

列寧寫道：“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材來着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情，不過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辦法都是不值一駁的無稽之談”（《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在中國同志們的文章里有許多“由他們的想像而特別造成”的這樣“虛構的人材”，這些人他們能夠面對着全球遭受熱核毀滅的景象連眼睛都不眨一下。能夠冷漠地預期着這種情景的人（當然，只能是虛構的）將永遠不會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實際上不會有這樣的人，也沒有這樣的國家。這些當然是一些“波將金的村莊”^①。

真實的人、具體的人，是具有向往和平與自由的具體希望和抱負的；而代表人民最高利益的各個共產黨，終歸會战胜這種幼稚病的。生活要比二十五點綱領伟大得多，現時已然存在的和行將在非洲各國成立的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所积累的經驗以及用很高代價取得的、同樣也是用痛苦的代價取得的智慧，將會战胜最近這次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挑戰。

因為可以論證的真理就在於，唯心主義的、主觀主義的綱領是爭取不到群眾的；“左傾”總是要失敗的。它代替不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

*

*

*

① “波將金的村莊”指虛假現象。波將金是俄國女皇葉卡德琳娜二世的宠臣。有一次女皇出巡克里米亞，他偽造了一些村莊，製造虛假的繁榮景象，以欺騙女皇。——譯者

当馬克思还是个十九岁的学生时，曾写信給他的父亲說：“我体验到現實和理想二者之間的矛盾所产生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种激动人心的力量是具有巨大的創造力的，而現實和理想二者之間的矛盾終于从哲学上和方法上被成年的馬克思解决了。由列寧丰富了的并且具有新的成果、現在又一次经历創造性发展的馬克思主义，由于不仅給予各国人民以到达共产主义的希望而且給予他們以方法和自信心，因而在实际中正在解决这个矛盾。沿着这条道路上，存在着許多“左傾”的障碍，这是資产阶级历史所遺下来的东西。但是，把革命的原則和实践，同在每个阶段推进整个运动所需要的策略結合了起来，总是无往不利的，因为这种做法是合乎現實世界的。

我們都是馬克思主义的学生，其中也包括那些这样隨随便便地就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余部分貶斥为背叛和机会主义的中国人在內。

承担了由自己指定的改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使之納入“左傾”方針这一任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好还是回到他們这样隨便引用但却不能充分理解其精神的经典著作上来。他們应当去掉在共产主义理論上的自大，本着科学批判的精神來重新学习这些经典著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許会在他們自己的队伍中激发起作为列寧方法論的精髓的調查和具体研究的精神。

(譯自1964年第1期加拿大《馬克思主义季刊》)

《今日的問題》序言

萊斯利·莫里斯

報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总是說，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分歧。

这种意見同他們大多数其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意見是差不多一样无知的。很少有人問共产党人的意見。公众从自称的“专家”那里得到歪曲的、有偏見的和往往是恶意的报道。

这本小册子是加拿大共产党人自己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而发表的声明和文章的汇編；这些問題包括战争与和平、热核武器、裁軍、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道路，以及共产党对本国人民和对自己所依据以成立的世界范围的原则所承担的責任。

讀者将会看到，加拿大党虽然一开始即毫不犹豫地就中国人所提出的一切重大政策問題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批评意見，但是它是作为同自己的纲領“加拿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关来这样做的。这个纲領的許多基本論点——都是经过若干年的討論才通过的——同中国人的观点是直接相反的。

如果沒有別的事情发生，仅是中国人在1960年4月就列宁九十誕辰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文章一事，加拿大共产党也会因为自己的纲領而被迫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爭論的。在加拿大共产党纲領和中国领导人所首先充分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的那篇文章之間，对于最具决定性的一些問題——特别是关于避免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人所沒有认识

到的，即关于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应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这种可能性轉变为現實的問題，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这种爭辯随后扩大到許多問題。但是很自然，人們感兴趣的首先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以及怎样保持和平的辯論。这是說明一些乍看起来好像是学术性的論证怎样，实际上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自身前途的一个例子。我們在这里討論的不是課堂上的問題，而是最关重要的資本主义制度和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个問題的結果，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們一直感觉到，把在加拿大发表过、只有加拿大共产党及其发言人对之負責的關於这些問題的資料翻印出来，会是有益处的。我們沒有特別为这本小册子撰写什么东西。這是一件让紀錄自作表白的事情。

加拿大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自己的立場，并且同世界上大多数的党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錯誤觀点。讀这本小册子时，对这一点是清楚的。在共产主义大家庭中进行的这場思想战斗，将会有其他的事态发展，加拿大党将研究这些发展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首先是要在我党借以产生的那些原則的基础上的团结。沒有这些原則，就决不会有共产党在任何地方出現。現在这些原則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领导着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党的挑战。在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間的保卫馬克思主义而必須一再进行思想战斗，这是令人遺憾的，但显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場战斗，虽然也許是严酷和悲慘的，但其結果是不成問題的。正在我們面前改变着世界的那些社会主义原則和从这些原

則產生的策略，最終將在中國，正如在世界各國一樣，獲得勝利。

方針政策的考驗，在於它在改變世界方面是否有成效。中國人的不現實的“左傾主義”以及他們未能依據由於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强大和帝國主義操縱世界的力量的急劇下降所造成的新形勢而規定的方針政策，將經不起實踐和真理的考驗，也將不會成功。

對這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

最後說一句：讓共產主義的敵人不要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意見分歧笑得太開心吧。正如喬·路易斯^①一度所說關於希特勒的話：“他要去加以整頓的美國，並沒有什麼毛病！”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什麼共產黨人自己不會糾正過來的毛病。共產黨隊伍的自我糾正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將會再一次克服內部困難，並恢復這個一切政治運動中最現代、最文明和最科學的政治運動的團結。

(譯自1964年1月加拿大出版的《今日的問題》一書)

① 美國拳擊家。——譯者

在中国逗留了四十四个月以后

——回答一些問題

伯特·怀特

伯特·怀特以《論坛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了近四年以后，于12月中旬从中国回到了加拿大。他现在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成员。我们要求他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请他就他所见到的谈一谈对中国生活的观感并以此题《論坛报》的读者。

但是，怀特在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以前，曾作了以下的說明：

“在中国逗留了四十四个月，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中国問題专家或中国人問題专家。但是这段时间却足以比那些在中国逗留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就在許多书籍里向世界人們报道了他們所获得的表面印象的旅行者挖掘得更深一些；而且这段时间可以使得人們比那些在香港仅仅停留了四天来获悉发展情况的政治权威能更好地評价中国的进步和缺点。

“我也願意說明，下边这些回答是我个人所作的結論。”

问：在你在中国居留的期间，中国是否在经济方面作出了任何重大的进展？

答：我在1960年3月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正处在由于自

然灾害(洪水、干旱和颶风)加上各級領導所犯的錯誤而造成的巨大的經濟困難之中。1958年的“大躍進”把工業打亂了，人民公社所採取的形式也增加了自然灾害帶來的困難。

不過，最初的那陣“共產風”並沒有持續多久；他們採取了措施進行了糾正，1960年和1961年的嚴格定量供應導致了糧食和商品的平均分配。營養不良現象普遍發生，可是避免了飢荒。

重點從重工業轉向了農業和輕工業。“支援農業”的運動收到了效果。儘管政府自1960年以來一直沒有公布過生產數字，但據消息靈通人士的猜測，1963年的糧食產量約為二億噸。一般說來，這個國家已經恢復到1957年的經濟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已超過了1957年——像水利工程、種樹和工業基礎更加穩固等。

問：你提到領導方面犯的錯誤，後來又糾正了這些錯誤，你能夠具體地談一談嗎？

答：在工業戰線方面所犯的錯誤如此之大、如此之複雜，以致於只有寫上詳細的長篇文章才能把這些錯誤說得清楚。從根本上來說，中國人想要躍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必不可少的初步階段。

在這次談話里，我願意僅就農業方面的錯誤簡略地談一談。中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

1958年，就是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一年，農業獲得了豐收。這些龐大的計劃往往把上十萬之多的農民結合起來放在新的毫無經驗的領導之下，可是却沒有適當的會計體系。絕大多數公社的領導人完全出於誠意地向北京報告了大大膨脹了的農產品的產量數字。總數表明收穫的糧食為三億七千五百万噸。

政府和黨的領導人根據這些錯誤的數字制訂了1959年的計

划，把指标定为五亿二千五百万吨。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6月（恰恰就在公社成立之前）接見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一位农民出身的主任时曾乐观地预言說，中国的农业产量不久就可以达到每人每年一千斤（一斤等于一点一磅）粮食、一百斤猪肉、二十斤食油和二十斤棉花。

毛的估計錯誤了。四年以后，即1962年4月，每人每年的平均定量是三百六十斤粮食、二斤猪肉、二斤食油和十呎紡织品。

早在1959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統計員們已经大大地过高地估計了1958年的粮食收成。数字经过修正后，从三亿七千五百万吨下降到二亿五千万吨，1959年的生产計劃也相应地縮小了。

1960年和1961年遭受洪水、干旱和颶风的損害的面积很广泛。这两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大概在一亿五千万吨到一亿七千五百万吨之間。

在公社的领导方面也作了根本的改变。控制权大部分交給了生产队——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合作社。許多公社都分成了两个甚至三个社。工业方面开始了“支援农业”的运动，生产更多的拖拉机、肥田粉、杀虫剂和简单的农具。

这些改革所收到的效果是在1962年和1963年有了較好的收成。1963年11月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市場上粮食充足，許多消費品已经不屬於定量分配之列了。

问：你把它归咎于自然灾害再加上人为的錯誤的严重的经济局面，有没有引起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任何信心？

答：沒有，沒有达到任何严重的程度。中国领导人說，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支持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尽管有个別人犯了錯誤，但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比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优越。

中国沒有人想要蔣介石回来。虽然人民在1960年和1961年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但是他們很清楚，要是在1949年解放前夕的旧政权下，千百万的人民会要活活餓死的。

他們記得1934年的那次饥荒，那时，全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討飯，那时，母親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卖給有錢的地主人家去作奴婢。

那些可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问：1962年，人們从广东逃往香港、从新疆逃往苏联，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是的，那年春天，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确实离开了他們的国家。在广东省，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尽管連具有偏見的香港報紙也承认說大多数难民看起来面无饥色），一部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在新疆省，汉人担任官吏是一个近因；那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对苏联境內的他們的兄弟少数民族总是怀有一种亲密的感情。

汉人占中国人口的94%；汉族主义的滋长已经在那些少数民族占居民多数的地区里造成了許多問題。

问：你所說的汉族主义的滋长指的是什么？民族主义不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嗎？

答：必須看一下历史才能找到你的这个問題的答案。中国人說，他們的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这就是他們的国家所以伟大的证明。但是，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并不是用时间的长久来衡量的。真正的中国文明是在汉朝第一次出現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时候开始的。

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和唐（公元618年到907年）两代是中国文明和文化达到最高峰的两个时代。自此以后，中国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和西方的文明相媲美了。

但是今天，中国正在努力克服千年以来的封建主义和半封建主义；明天，她的成就可能使她再度置身于世界的先进国家之列。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把周围的各个民族写成是“蛮夷”，但是，只要稍微看一下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出在某些时期内，这些所谓的蛮夷——突厥人、蒙古人、吐番人——都是一些至少具有和中国人相等的历史和文化的邻居。

即便是中国在封建的泥沼中度过了多少百年以后，尽管欧洲正在蓬勃发展并且早期以来就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超过了她的时候，北京的文牍官员们还是把欧洲人叫做“夷人”。

不妨回顾一下清朝（满洲）乾隆皇帝在1793年拒绝乔治二世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而下给他的那道言词傲慢的敕谕：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

我想要说明的一点是，汉族主义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在目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那种傲慢的语言并不是出于什么社会主义，而且这个民族的历史遗物。

俄罗斯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半数；汉人占中国七亿人的94%。请注意，其余的6%总计在四千万人以上。这点区别就造成了显著不同的两个政治结构；在苏联，是一个自愿的共和国的联盟；在中国，则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尽管中国人曾经作过努力，特别是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要反掉这种由来已久的汉族大国沙文主义，但是近几年来，汉族

大國沙文主義還是迅速地滋長起來，並且幾乎在所有小種族集團居住的地區里都造成了嚴重的局面。

問：重工業方面的情況如何？

答：有許多迹象表明，中國正準備在工業戰線上作一次新的推進。這一次不是“大躍進”，而是穩步往上爬。我的看法是，不出明年，一個工業擴展的計劃就會開始。

問：中國現在是否得到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

答：是的，儘管蘇聯專家在1960年離開了中國，目前大約還有八個工業建設項目正在進行中，這些都是由蘇聯提供藍圖和全套的厂房和設備的。

問：加拿大和中國之間的增大貿易的前途如何？

答：我認為，只要我們願意發展有買有賣的貿易，前途是大有可為的。目前，日本正在極力地想要和中國作更多的生意（而且獲得了成功）。在最近的將來，中國和法國之間的貿易無疑也將增加。英國特別有意於發展長期貿易的前景。

但是直到今天，加拿大除了跟中國作過一大筆小麥交易外，實際上一直沒有把中國當作是遠東的最大和可能的顧客。

（譯自1964年1月20日《加拿大論壇報》）

中国人的“分裂活动”遭到反对

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下面是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委会上星期发表的一个声明：
我們对《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編輯部最近所发表的題為
《苏共領導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的文章感到非常不安。

这篇文章的唯一实质性內容是主张分裂，主张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主张成立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国际中心，其目的是强制推行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抗的、危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正在肆无忌憚地力图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內的各国。由于它采取这种行动，它正在削弱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战线。

我們的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分裂活动。中国党的領導人最近的这种强行造成分裂的肆无忌憚的企图，使我們不得不指出：必須在各級党组织反对这种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毫无顧忌的企图。我們坚持我們在拒絕中国领导人的完全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路线时一再采取的立場。

若干时候以来，我們党一直主张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我們认为，正在发展中的局势，使得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以便團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力量来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世界运动的文件。

(露自1964年2月24日《加拿大論壇報》)

列寧早就揭露過中國領導人在今天的運動中所使用的分裂的策略

蒂姆·布克

中國共产党领导人現在已經採取了一個步驟，除非他們及時认识到他們的錯誤，否則這一步驟將在各地被人認為是他們決心要破壞世界共产主義運動的证据。

中國党的中央委員會根本不理会世界大多数共产党提出来的至少在共同研究一切发生爭執的問題以前停止公開爭論的呼吁，現在它已表明它在去年6月間公布的二十五点誹謗性的反对派纲領并不是它准备进行的誹謗性挑衅运动的最大限度。

中國党的中央委員會在它的反对經過各次国际會議一再通過的政策的二十五点反对派纲領中相当露骨地暗示，那些准备接受它的领导的人應該組織派系，趕走他們党的目前的领导。

反 对

二十五点纲領的作者还暗示，在他們的支持者不可能推翻目前的领导的国家內，應該建立反对党。这些“党”轉弯抹角地得到了中国人积极給予支持的保证。

中國党以各种文字在全世界非常广泛地散布这个反对派纲領。他們非但沒有停止公開爭論，反而加强了他們的运动。

由于这一点，由于沒有亲自经历中国同志們提到的那些事情的年轻的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学生和其他人正在閱讀并討論

他們的宣传品，因此加拿大共产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重新发表它关于中国同志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党之間的爭端的主要文件和評論。

这本书是以《今天的問題》为书名发表的。它的二十四章，或二十四篇重新发表的文件談到分歧发展到目前这种分裂世界运动企图的整个过程。这本书由于下述种种原因会使加拿大人特別感到兴趣：

这本书完全駁斥了这种卑鄙的暗示：不同意中国领导人的那些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指揮行事的。

曲解

这本书說明，加拿大党是完全独立地闡明它的立場的。事实上，我們是在苏共领导就这个問題发表意見之前很久就同中国同志发生爭执的。

这本书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加拿大的应用情况和加拿大党的纲領說明中国同志所犯的錯誤。

这本书从它重新发表的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如何从因解释不同而发生爭論堕落到进行粗卤的不负責任的曲解和謾罵。

如果对于是否有必要在《今天的問題》一书中重新发表文件这一点有什么疑問的話，那末現在中国领导最近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編輯部名义发动的进攻就能回答这一切問題了。

最近这篇文章甚至比去年6月发表的二十五点反对派纲領还要轻率，还要不负責任。这是公然露骨地企图要建立一个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領導下的有组织的国际反对派运动。

这篇文章的作者堕落到了进行宣传的水平，这使他們得以

寫道，“蘇共領導走上了徹底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道路”。他們斷然地說，蘇共領導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宗派主義者和分裂主義者”。他們把蘇共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說成具有“封建心理”。這只是這篇文章中的許多這樣不負責任和挑畔性的誹謗中的三種說法。

他們的文章的性質在第一段就說明了。它一開始就無恥地捏造說，“在國際範圍內，在一些黨的內部，都存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激烈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面臨着空前嚴重的分裂危險。”

這些字眼表明了作者的主觀想法。如果他們的願望不是如此輕率，那末人們甚至可以把它說成是天真的。他們在用字眼方面非常自信，以致他們在進行攻擊時首先宣布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說，他們可悲地低估了工人階級的智力。

是發展規律嗎？

他們處心積慮地企圖使分裂顯得好像是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規律。他們機械地把自然的規律應用於社會組織，特別是應用於共產黨。他們寫道：

“……國際工人運動，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總是一分為二……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這種或那種機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正在在這種對立面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團結、經過鬥爭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就是國際工人運動發展的辯證法。”（《紅旗》，1964年第2—3期，第10—11頁）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言論。把破坏團結、分裂作为目標，是要打击工人阶级，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打击爭取和平的斗争，打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不能原諒的，即使是出于无知，也是不能原諒的。

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規律是維护團結、反对分裂者而进行的不倦斗争的規律。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包括我們加拿大的运动的历史在內——表明，分裂和瓦解的主張一直是历代每个反工人阶级集团的仓库里的貨色。

文章的作者們用了許多引語来裝飾他們的反列寧主义的煽动性言論。他們斷章取义地大量引用列寧以及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話。

暴 露 出 蔑 視

他們閉口不談而且也希望讀者們注意不到他們正在想做的同他們所引用的那些言論文章的本来写作目的之間多么显著地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全都为工人运动的團結而斗争。他們在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錯誤进行斗争时，是为了維护他們自己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的那个运动的團結而斗争。相反，中國领导人却正在几乎是歇斯底里地煽动分裂。

这篇文章的作者們在提出他們的論点时顛倒黑白，暴露出他們对讀者的蔑視。他們斷言苏共試圖扩大團結的做法是在分裂工人运动。他們根据陈旧借口要求他們的支持者必須分裂他們所在的党。

他們的論点唯一真正的邏輯等于是說，凡是不同意中國领导人的看法的人都是分裂主义者，而接受他們的领导的人就是通过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團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

們企图引用下面一段列寧的話來支持這種愚蠢的說法：

“哪裏大多數覺悟工人在明確的決議指導下團結起來了，那裡就有統一的意見和行動”，而機會主義者“就其最無恥地違背大多數工人意志這一點來說，恰恰就是分裂主義”。（《紅旗》第11頁）

這段完全正確的話是列寧在徹底揭露托洛茨基企圖用無原則的手段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製造分裂、以期使托洛茨基集團從中撈取好处時說的。

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列寧當時譴責的恰恰就是中國同志們現在想要做的。列寧一開始就揭露了托洛茨基的聲稱主張團結、反對宗派主義的聲明的內容。列寧寫道：

明明白白的例子

“托洛茨基稱自己的新雜誌為‘非派別性’雜誌。他在廣告中把這幾個字放在首要地位，他用各種調子在編輯部文章中強調這一點”……“什麼叫作非派別性呢？……最壞的派別活動殘余的最壞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別性’的幌子來欺騙年輕一代的工人。這一點很值得加以說明。”

像中國黨今天的誹謗一樣，托洛茨基當時指責列寧在先進工人的隊伍里製造分裂。托洛茨基散布說，以《真理報》為中央機關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遭到“分裂主義”的破壞。托洛茨基繼續說：“分裂主義正在取得一個接一個的自杀性的勝利。”讀者們應該注意托洛茨基所說的“分裂主義”同中國領導人所說的“分裂主義”之間的關係。

列寧是這樣回答的：“托洛茨基並沒有威脅說要‘殺死’我們這一派……而只是預言我們這一派‘會自己殺死自己！’……這不是說得客氣多了嗎？這不是已經同‘非派別性’言論相差無几

了嗎？”

但是，列寧繼續寫道：“分裂主義是一種嚴重的政治罪名。”托洛茨基在各流亡集團內散布這種指責。托洛茨基寫道：“許許多多在政治上處於茫然失措狀態的先進工人，往往自行成為分裂派積極的代理人。”

列寧評論托洛茨基的這種話說：“這幾句話難道不是揭示了對問題最不嚴肅的態度嗎？”列寧又繼續寫道：“看到這樣的东西，人們不禁要問：這種喊聲是不是從瘋人院里發出來的？……絕大多數先進工人恰恰是擁護支持‘一月（1912年）路線’的……但是，托洛茨基只是謾罵這些先進工人是‘分裂派’、‘政治上茫然失措’以此來支吾搪塞。”

列寧在這段話後緊接着就對托洛茨基的錯誤解釋和“毫無意義地重複在昨天曾經是正確的東西，即在過去的時代曾經是正確的東西”作出了一段結論。

最後的答復

讀者們也許會注意，中國領導人恰恰就是斷章取義地引用了列寧的這一段結論。他們小心地略去了這一段話的第一句。整個這段話應該是：“只要不是瘋子，都會從這些事實中作出另一種結論。哪裏大多數覺悟工人在明確的決議指導下團結起來了，哪裏就有統一的意見和行動，哪裏就有黨性和黨。”

對中國領導人的最後的答復就是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而从中抽出幾個字來的那篇文章。

（列寧答復托洛茨基的全部引文都是引自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一文，《列寧全集》第20卷）

（譯自1964年3月2日《加拿大論壇報》）

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加拿大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4年3月27日至30日)决议

我党上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取过蒂姆·布克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問題的报告，这特別是因为这些分歧同我們自己的纲領和政策有关。从那时以来，这些分歧变得更加尖銳了。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2月4日的《紅旗》杂志文章中把开始时的思想分歧轉变为以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和个别共产党和工人党为目的的有組織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現在公开地认为分裂是正当的，并且加以鼓励，从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在实际上致力于建立一个在它的領導下的国际中心，以推行一条同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會議所一致同意的、体现于这两次會議所通过的文件中的路线完全不同的战略和策略路线。

这种进程，如果坚持下去，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将由于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从而削弱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陣线，而使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轉变为有利于帝国主义。

世界运动的分裂，将是帝国主义所获得的最大的好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致力于促成这样一种分裂，試圖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进行“混水摸魚”，以便破坏世界运动的团结。

在这种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中，有必要避免使情况恶化，并逐步地、耐心地解决已经产生的分歧，使这些分歧从属于加强世界运动团结这个第一需要，从而加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运动。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不仅有必要停止公开论战，而且有必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弃它的分裂政策，并同意进行耐心的讨论和解决分歧。

历史将永远不会饶恕中国党的领导人，如果他们继续奉行蓄意要瓦解和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策的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提倡的、并作为各国共产党“总路线”而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同我党的民主制定的纲领和政策相违背的。我们拒绝那些方针政策，并维护我们的立场反对任何的攻击。

本代表大会批准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如在题为《今日的问题》小册子中所刊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各种文件。

同时本代表大会认为，在党内和在有进步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加拿大人中间，都有在思想意识上对于有关的基本问题取得更明确的了解的需要，并责成党的下届各领导委员会对这些问题以及加拿大人民所面临的其他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取得更深刻的认识。

本代表大会号召我党全体党员拒绝中国领导人的完全错误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且大力地反对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本代表大会宣布，我们党将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一样，耐心地并以同志般和兄弟般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尽力恢复和巩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以及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坚定和有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本代表大会批准全国委员会所采取的敦促尽可能及早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会议，以恢复我们世界运动的团结的行动。

(译自加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1964年3月27—30日〕公报)

苏联專家为什么回国

——关于对中国援助問題的報告

伯特·怀特

苏斯洛夫今年2月14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上第一次詳細地說明了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范围。

因为我在旅居中国的四年当中看到了这种援助的結果，因为中国人今天正在企图贬低他們从苏联那里接受到的大量援助（而且甚至企图把他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也归咎于苏联人），所以除了摘录苏斯洛夫的報告外，另外再补充一些我亲眼看到的第一手情况，这可能会使《論坛报》的讀者感到兴趣。

苏斯洛夫說：“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的期間內建立了两百多个拥有最新设备的大型工业企业、車間和其他項目。在苏联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完整的工业部門：航空工业、汽車拖拉机制造业、动力机器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仪器制造业、无线电工程部門和各种化学工业部門。

“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和改建的工厂使中国能够每年生产八百七十万吨生铁、八百四十万吨钢、三千二百二十万吨煤和油母頁岩。在錫的生产中，在我国援助下建成的企业的产量，占每年产量的70%，在合成橡胶的生产中占100%，在电力生产中占25%到30%，在載重汽車和拖拉机的生产中占80%。在苏联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国防工厂是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基础。”

当然我並沒有看到——也沒有要求去看一下——中国的任何国防工业工厂。但是我的确參觀过北京附近的钢铁厂和武汉钢铁厂、伟大的三門峽水电工程、巨大的洛阳机器制造厂和大型拖拉机制造厂；一共有好几十个工业企业。

1961年春，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一位厂长領着我各处看的时候对我說，这个厂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修建起来的，生产的是苏联T—54型拖拉机的复制品，这是一种五十四匹馬力的履帶式拖拉机。他說，“这个厂的設計能力是每年生产一万五千台拖拉机，但是我們現在只能生产大約八千台，再加上一百万件零件。”

1963年当我再去參觀这个厂的时候，副厂長安道平（譯音）就不那么坦率了。他沒有提到苏联的援助，当我問到他这方面的情况以及生产情况的时候，他只簡單地說：“大部分是我們自己搞的。无论如何，我們改进了他們的拖拉机。我們正按照設計能力进行生产。我們是不发表任何生产数字的。这些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中国拖拉机。我們的設備大部分都是中国造的。”

“是我們自己搞的”这套說法在1960和1961年几乎是听不到的，在1962年才开始听到，到了1963年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觀念。

苏斯洛夫說，“中国人为了力图使人民忘記苏联的援助，居然取下了苏联車床和其他机器上的商标，并且声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是过了时的装备。”

苏斯洛夫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即使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也不是很多的。1963年我同来自几个国家（英国、苏联、羅馬尼亞、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的十多个記者一起，訪問了好几个工业城市。我在洛阳采矿机器厂的八个主要車間里轉了一圈，发现大部分重型机器都来自苏联和德国，虽然有一些小型車床是由中国造的。有一些机器上，制造厂的牌牌被

取掉了。在介紹情況的時候，他們對我們說，“95%的機器是中國造的。”

另外，在太原重型機器廠，廠長陳鳳才（譯音）說，這個工廠是在中國設計的，而且主要是由中國的機器裝備的。但是，人們在進行觀察以後發現，主要的機器都是來自德國（希斯）、匈牙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斯科達）、日本（一座唐津鋼鐵廠製造的巨型立式車床）和蘇聯。那裡也有一些中國造的小型車床。

蘇斯洛夫說，“在1950年到1960年期間，先後向中國派遣了一萬多名工作期限不同的蘇聯專家。在1951年到1962年期間，大約有一萬名中國工程師、技術員和熟練工人以及大約一千名科學家在蘇聯進修和實習。在這個期間，有一萬一千多名大學生和研究生從蘇聯高等院校畢業。

“1953年以後，根據蘇共中央和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的倡議，消除了在斯大林個人迷信時代所強加於蘇中兩國關係中的不平等的因素，蘇中合作達到了最高峰。毛澤東在1957年曾經說過，‘在中國問題上，消除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和芥蒂的功績歸於尼·謝·赫魯曉夫。’

“1959年蘇中經濟關係的規模，比1953年增長了將近一倍，而這個時期對建設工程的供貨量則增長了七倍。在1954年到1963年期間，蘇聯供給中國兩萬四千多套科學技術文件，包括一千四百個大型企業的設計圖。這些文件包含了蘇聯人民及其科學家和技術員們所積累的廣博經驗。”

我在1960年3月抵達中國的時候，人們從生活水平降低和嚴格的定量中感到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及新的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所犯的錯誤的影響。

中國領導人不肯正視事實並承認在工農業方面犯了嚴重的

錯誤，他們試圖用大力推行“技術革新”運動來推卸自己肩上的責任。從表面上看，這是為了解放工人的潛力和創造性——這是值得稱贊的目的。中國工人響應了這個運動，提出了許多具有天才的和往往是有價值的意見和創造。

但是，當錯誤的主張提出來並為外國（和中國）工程師和專家否決時（這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就對工人說，他們可以“反對和推翻那些反動和保守的”專家的決定。不久專家就再也控制不住工廠了，他們的地位維持不住了。

我想起在一家鋼鐵廠中發生的一件事情，那裡一個工人由於節約了幾罐潤滑油而受到表揚——他“發現”捷克斯洛伐克機器用規定的油的一半也能運轉得“一樣好”。我無需講這樣做的悲慘的後果了。

蘇斯洛夫說，“我們專家在中國的最後幾年，正是實行‘大躍進’政策的時候，實行這一政策的結果是違背了一切公认的技术規範。蘇聯專家不能不看到這一政策的危險後果。他們向中國的當局提出警告，不可違反技術要求。可是，他們的忠告沒有人理睬。

“由於無視蘇聯專家的建議和中國領導人員粗暴地違背技術規範的結果，會發生過有時有人命傷亡的重大事故。例如新安江水電站工地的事件就是這樣，那裡由於忽視技術要求，策果數以萬噸計的岩石崩塌，工程耽擱了很長時間。在新丰江水電站，由於同樣的原因，圍堰沖毀，基坑淹沒。這兩起事故都有人命傷亡。這是很自然的事：蘇聯工程技術人員不能對這一切漠不关心。他們提出了抗議，但因沒有人理睬，他們就要求讓他們回國。”

我聽到過關於蘇斯洛夫上面所說的某些情況的傳說，但是沒有得到第一手的材料。不過，從我自己的接觸中，我知道在北

京和北京附近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我可以透露，有一次，爭执达到高級方面，周恩来主张一种政策（关于一座高炉投入生产的速度），而刘少奇主张另一种政策。刘的冒险政策占了上风，高炉用得太早了——結果导致了灾难。一个中国工程师（他后来离开了中国）被批評有保守主义，并且由于要求采取謹慎态度几乎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0年的夏天，苏联人召回了他們的专家。于是在中国國內，中国領導人立即把他們所有经济方面的过错都归咎于苏联专家的撤退。但是，正如苏斯洛夫所說：

“人人都知道，还在苏联专家召回以前，中国的经济困难就已发生，这些困难是由于‘大跃进’的危险的試驗而产生的。第二，最大的困难恰恰是发生在那些苏联专家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苏联专家的经济部門。

“举例來說，1960年在煤炭工业部門工作的只有两名苏联专家，在农垦部工作的只有三名，在农业部和林业部工作的各有一名专家，那末，苏联专家的召回又怎么会影响到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林业、轻工业和其他工业呢？然而，恰恰就是这些部門，特别是农业，遭到了最大的失敗。

“难道現在不正是中国領導人停止哄騙他們的党、他們的人民和世界輿論并把产生这些困难的真正原因照实讲出来的时候了吗？

“这些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共领导人在他們的經濟政策中完全忽視了客观規律这样一个事實。”

今天任何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关键性任务都是贏得資本主義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間的經濟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設任务。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最終将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并在这場斗争中

获胜。

但是不应当忽视，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错误的、冒险主义的经济政策不仅损害了他们本国的人民，而且也损害了全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管搬用多少“革命”辞藻，这个事实也是掩盖不了的。

（译自1964年4月27日《加拿大论坛报》）

維护團結，反對分裂

蒂姆·布克

爭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是加拿大共产党今年3月底举行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要問題之一。加拿大共产党人所以一貫重視維护團結，还因为我們黨內有許多从世界各国移居来的工人。但是，自从1920年^①以后，我們直接面临积极維护无产阶级的團結和反対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制造分裂的狂妄企图的斗争問題，还是第一次。因此，在代表大会上討論这个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加拿大共产党人一开始就譴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他們的行动，特别是他們认为可以背着兄弟党的領導把自己的宣传滲入各国的做法。中国領导目前所进行的宣传，粗暴地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学觀點，同加拿大共产党的纲領完全对立。

中共中央最近所散发的文件，例如它今年5月7日的信件，再一次使我們看清了这一点。这封信的全部內容和語調都說明中国领导人不願意克服分歧，并在事实上反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主张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兄弟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都坚决譴責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場，完全贊同苏共中央今年6月15日的复信。

① 1920年在加拿大曾进行了一次关于如何使加拿大共产党人的地方组织达到團結的广泛辯論。后来，所有站在馬克思列寧主义旗帜下的加拿大工人联合成为加拿大共产党。

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毛澤东主义”的纲領，或劉少奇称为“中国或亚洲的馬克思主義”的纲領，在当代的一系列极重要問題上都是同馬克思列寧主义有分歧的。在下面的一些問題上都存在着矛盾，如关于苏联建設共产主义的纲領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和列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主要以自己的经济优越性来影响世界政治的論点；关于某些国家在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时有可能通过非暴力的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問題；关于核武器对現代战争性质的影响問題。在所有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重要問題上，中国领导人推翻了他們自己在1957年和1960年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道签署的宣言和声明。

加拿大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須揭露中国领导人强加于人的反列寧主义的政策，反对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企图。

絕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譴責毛澤东关于原子弹“只不过是紙老虎”的說法。他們知道，这也关系到加拿大的命运。一旦原子狂人达到目的，把人类推入核战争，那时无论对加拿大人來說，或对其他各国人民來說，用毛澤东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就都晚了。我国广大社会人士都很清楚，按照美国的所謂核防御計劃，加拿大广大地区已預先被規定将变为废墟。在美国，从大西洋起到太平洋沿岸，遍布火箭发射場，在加拿大和美国边界以南集中了“鮑馬克”式导弹。根据參謀長聯席會議代表霍洛威將軍向华盛顿国会的一个委員会所作的說明，一旦遭到有人駕駛的轰炸机或导弹的袭击，将有三十二个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装置向北发射，在加拿大上空爆炸。一位专家曾解释說，如果发射装有核弹头的“鮑馬克”式导弹，则像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哈密尔頓、溫尼伯、卡耳加里、溫哥华和新韦斯特明斯特这样一些城市便立刻化为焦土。

加拿大人民懂得核战争意味着什么。中国领导人的路线，特别是他們对待核武器和核战争危险的态度，使越来越多原曾同情中国领导人的人都不再相信他們了。

《消息报》的讀者都知道，1963年4月加拿大举行了議会选举。这次选举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是否允許核武器进入我国？美国政府坚持要加拿大准許核武器入境。內閣总理、保守党領袖約翰·迪芬貝克拒絕了美国政府的要求。在美国进行訪問的自由党領袖累斯特·皮尔逊在回国后說，他准备支持运入核武器。在美国政府公开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党击败了迪芬貝克政府。但是，在选举过程中，大多数选民都投票贊成那些反对准許将核武器运入加拿大的候选人。自由党人所得的票数不到40%。尽管多数选民反对运进核武器，可是坚决主张运进核武器的党却组织了內閣，这是因为这个党在議会中所得的席位比其他任何党都多。这是加拿大选举制度的特点所促成的。

少数派政府依靠一伙代表社会信用党的議員的帮助，在众議院中获得了多數票，众議院允許了政府批准許可核武器运进加拿大的法律。当这一法律生效时，人們才發現它的条文可以解釋为：政府不仅批准运入“鮑馬克”式导弹的核弹头，而且批准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体系內的加拿大军队运入核武器。自由党政府給了美国擴武主义者在加拿大各地儲存核武器的权利。

加拿大人民滿腔热情地欢迎莫斯科條約。人民群众贊同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部分禁止試驗核武器條約是緩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第一个重大步驟。这项條約为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开辟了前景。”

加拿大需要和平，这首先是为了要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下去。但是，除此以外，加拿大人民还应当为和平共处政策进行斗争，因为这一政策是我国摆脱美国統治的必要条件。共产

党有資格以这一斗争的历史而自豪。共产党人在刚刚开始进行这一斗争的年代里，还是孤立无援的。我們曾提出警告說，如果美国壟斷資本在经济上占了决定性的地位，那么它很快也就会在政治生活中占統治地位，这一警告当时曾受到譏笑。而现在，加拿大的广大爱国人士，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加入了我們反对美国操纵的斗争。

对于一切支持有利于加拿大对外政策民主改革的行动的人，共产党人都願意与他們携手。下面就是可以为争取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作出貢献的一些要求：

- 从加拿大撤走核武器，运回美国；
- 逐步采取能导致开始真正裁軍的行动，以打开日内瓦裁軍談判的僵局；
- 爭取使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为无原子地区。不允許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設置核武器，不为核勢力做任何事情，不准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NORAD)^①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器配置在加拿大的領土上，不为它們提供供应，不为它們服务；
- 大大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的互利貿易。

所有这些要求得到加拿大人民最广泛的支持。

我們必須像保护眼珠一样来維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能让中国领导人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和建立分裂主义者的国际派別組織的企图得逞。我們不应当因为分裂主义者在許多国家里仅仅是一小撮人这种情况而感到放心。不容許因内部冲突而損害我們的运动对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吸引力。最后，对于分裂主义者的行动可能会給帝国主义者以某种“喘息”机会的危

① NORAD——北美洲美国—加拿大联合防空司令部。

险，也不能估計不足。

对加拿大共产党來說，爭取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要从本国做起。我们认为，对其余各兄弟党來說，这一原則也是正确的。同时，我們的代表大会支持关于在最近期间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建議。代表大会强调指出，扩大和加强思想斗争对彻底澄清同全体党员和广大加拿大民主人士有关的一切問題具有重大的意义。

加拿大工人认清了中国领导人理論观点的錯誤性及其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认清了他們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的不负責任的企图，开始愈来愈深刻地了解到我們时代的性质和苏联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意义。愈来愈多的加拿大人意识到爭取和平的斗争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将来在全世界的胜利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譯自1964年7月24日苏联《消息报》）

中国：幻想与现实

伯特·怀特

《加拿大論坛报》編者按：这篇长达四版的中国“特約通訊”是《加拿大論坛报》編輯部編輯伯特·怀特写的。他是1960—1963年本刊駐北京記者。文章中的各种看法是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写出的。

一、延安——革命的搖籃

演出过程中雨就停了，我們离开戏院的时候已是滿天星斗。我們凝視着山頂上的那座唐代古塔，塔四周的电灯使它的輪廓显露出来；我們凝視着山腰上成千上万窑洞里发出的閃閃灯光——大体說来有点像美国摩天高樓的夜景——，我們在想，“不錯，我們果然来到了这里，这就是延安！”

我們居然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来到了这个革命老根据地，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今天的旅行者絕不需要作万里长征。有一天上午，十点钟刚过，我們在北京登上飞机，中午左右就看到下面的黃河在山西省和陝西省的那些光禿禿的黃褐色群山中間迂緩地蜿蜒着；十二时五十二分，我們的飞机便在延安近郊长着青草的小型机場上平稳地着陆了。

一辆老旧的汽車載着我們在泥濘的道路上搖搖晃晃地开进这座小城，把我們送到了招待所。在这里，我和《工人日报》的特德·布雷克同住在一孔窑洞里。紙糊的窗户、土墙、放着我們的

毛毯的砖炕、放着脸盆的脸盆架、两把厨房用的椅子和一张不平稳的木桌——居住用具就是这些。

延安。延河与安河在这里汇合；在这个山谷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們住了十年以上的窑洞，组织了革命，组织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

当地的一所博物馆陈述了当年的一些故事：在軍閥和国民党統治下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1935年紅軍到达陝西以后的变化；反对日本侵略者以及包围、封锁并进攻共产党地区的蒋介石军队的军事反击。（1947年蔣軍二十七万人大举进攻，迫使紅軍撤退；仅仅一年之后，紅軍就胜利地回来了。）

我們參觀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所住过的几孔窑洞。我們看到了1942年毛在那里发表过有关文学与艺术問題的讲话以及1945年举行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那个建筑物（重建的）。我們还參觀了1942年共产党为了粉碎蔣的经济封鎖而展开的“发展生产”运动中，毛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特德·布雷克說这块土地不比普通英国人的宅后小园子大。）

在毛曾经一度住过的一孔窑洞里，我們看到一张他和妻子以及子女合照的像片——这使我想起，像片里的这个看来只有十岁的男孩，在朝鮮战争中和中国军队一道作战时被打死了。

今天有三万七千人住在延安城里，另外有一万人住在山腰的窑洞里。窑洞将来还会存在嗎？大概会，因为它們冬暖夏凉，住若干年用不着修理；因而許多人宁愿住窑洞而不喜欢住普通房屋。據說，从1958年以来，已经新修了七百六十孔窑洞。

延安地区仍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小米、玉米和大米），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小型工业——一家火柴工厂，几家瓷器和陶器工厂，还有一家造纸厂。

但是延安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小市鎮，沒有铁路交通，泥濘的土路就是“公路”。有一天，我們沿着这样一条土路去參觀一处公社时，不得不趟过一条急流。蹲在土屋子前面的老年人，吸着长长的装有铜烟袋头的旱烟袋，烟袋的荷包就挂在烟袋杆的脖子上；妇女在池旁或水边洗衣服；赤裸着的小小孩停止了玩耍，睜大了眼睛瞧着外国大鼻子。

* * *

毛澤东来到延安的时候不过四十来岁。他担任共产党的領袖仅仅只有一年，他是在长征期間在遵义由他召开的一次緊急會議后担任起这个职位的；在这次会议（根据党的規定是不合法的）上成立了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員會。以前，毛曾经在許多方面与中共領導不和，并曾一度被撤去中央委員的职务。但在遵义會議之后，他的政治路线所受到的挑战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毛團結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在1937—1945年所进行的侵略的决心，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威望。在抗日战争的几年中，紅軍吸引住了日本的十五个师——等于整个日本侵略軍队的一半。如果说和欧洲的大規模作战，特別是和俄国的戰場（这里有成百的师在交战着）相比，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那末，请不要忘記毛的部队是由不识字的农民所組成的，武器古老，装备低劣。他們打起仗来勇敢而出色，是完全值得世人后来对他们的称赞的。

根据外国觀察家的意見，毛在延安的时期比他的老年时期要謙逊，虽然在那些日子里，他和別人不在一起，夜間工作，白天睡觉。

1945年岡瑟·斯坦因訪問他的时候，毛談到苏联和美国之間的未来关系，提出了正确的見解，后来却又不再提了：

“我一点也不相信資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間的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毛对斯坦因說。“正相反，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深信，資

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战时一样都能够而且也会学习着紧密合作，尽管随时会遇到困难。我們決不能向失敗主义者不相信世界上有稳定的和平的可能性那样的态度让步，因为这种态度的本身就妨碍朝着真正的和平前进。

“中国能够而且必須成为这两个阵营之間的桥梁之一，而不希望作为磨擦地带之一而能获得国外援助。

“中国的进步有賴于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真誠地和一切国家合作、帮助它們克服它們的分歧，我們的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才能有所加强。”

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毛从他自己1945年所发表的明智的談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呢？

二、一个“不可能犯錯誤”的領袖

在1936—1937年这一时期訪問延安的最有理解能力的外国記者之一是艾格納絲·史沫特萊。她在《中国的戰歌》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第一次会见毛澤东时的情况：

“就在我到达延安并且会见朱德將軍的那个可資紀念的同一个夜晚，我居然能够訪問了毛澤东，因为他是夜間工作，白天睡觉的。訪問是在深夜，我掀开了一間山旁窑洞門上的棉帘子，迈进了一个幽暗的洞穴。在这一片黑暗的正当中的那个粗制的桌子上点着一支长蜡烛。烛光照在一堆堆的书籍和文件上，也照在头上低矮的土窑顶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桌上；他的脸朝着門口，背着光。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外面罩着一件肥大的棉大衣。他站在那里的那部分地面略略高起一些，因此他的体形就显得更为高大。窑洞里只有孤烛一支，因此显得朦朧幽暗，这种幽暗使得这里的情景显出一种阴暗的美。这

里好像是一幅古画，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看不甚清楚了。

“这个高大威严的身影慢慢地向我們移动过来，同时发出一种高音調的声音向我們打着照呼。然后他的两只手握着我的手。这双手长而又灵敏，像女人的手。我們彼此注視着，誰也沒有說話。他那黑黑而不可思議的脸是长型的，前額寬大，嘴像个女人的嘴。不管他是个怎样的人物，他的模樣像个美术家。事实上，他身上带有的那种女性和这种幽暗的背景使我感到嫌恶。我不禁从內心里油然地产生一种敌意。我一心一意地要想压抑这种情緒，以致他后来又說了些什么，我連一个字也沒有听到。

“我現在記憶中的毛澤东是以后岁月里产生了宝贵的友誼时的情景；这些岁月证实了、同时也否定了他的那种不可思議的地方。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阴暗的气质，证明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孤僻。朱德使人感到亲切，毛澤东则使人对之尊敬。有少数人后来終於对他十分了解了，因而对他抱有好感，但是他的精神是内藏的，因此把他和別人隔离开来。……他沒有朱那么谦逊。尽管他的身上带有一种女性的气质，他却非常固执，他的性格中深深地藏有无比的骄傲和决心。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情願等着瞧上好几年，但是最后还是要按照他的意見办事。

“共产党的其他任何一个領袖可以和别的国家或别的时代的人物相提并論，但是对毛澤东却不行。人們說，这是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本色，他从沒有到外国去旅行或求学。彭德怀、賀龙、林彪以及其他紅軍中的人物虽然也都沒有去过，但是他們在别的国家里都有可以与之比拟的人物。毛以理論家著称。但是他的理論的根源是中国的历史，是戰場上的经验……

“他的幽默往往是挖苦的、冷酷的，好像是从心灵的深处跃出的。我的印象是，有一个門通向他的内心深处，这个門却从来

沒有向別人打开过。

“作为一个語言学家來說，他和我同样是不高明的。为了弥补他的湖南方言的缺陷，他曾試图跟我的秘书学国語，跟我学英語。他学习英語歌子的努力慘敗了，因为他的語音是單調音。骄傲又使他不屑于去学跳舞。在他的气质中是没有节奏感的。”

关于毛的个性有一种有趣的間接說明，就是他从来没有认真学习汉族的主要語言——“国語”(現在叫“北京話”)。

1962年11月在我訪問长沙时，主人用車子把我送到附近的湖南省湘潭县属的一个村子去參觀，毛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的家过去有二十亩田地，是富农。在毛降生于其中的一座四柱大床上方，悬挂着一张他的父母的像片(他們在1919年去世)。有两个小神龕供俸着保佑这家人的神祇——其中之一是財神。毛的父亲留着长鬚，供着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神主牌位——就是这位祖父給这家人掙下了产业，买了田地。

很明显，毛的童年是无忧无慮的，是舒适的，家庭照顾得很好，还有僕人服侍。但是，和許多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社会制度不滿，还在求學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前途仍然是看不清楚的；有个时候他曾经要去当一名警察，甚至連申請书都已填好了，可是后来又撤銷了。又有一次他曾和一个朋友蕭瑜去乡間徒步旅行过(这个故事見蕭瑜写的《毛澤东和我是乞丐》，1961年伦敦赫欽森公司出版)。

毛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求學，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讀书。1920年，大約有两千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前往法国去見识一下外部世界。其中有很多人就是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李立三、李富春，这里仅仅举出这几个为例。朱德也曾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但是毛澤东对于出国不感兴趣——对他来

說，就像对以前古代帝王一样，中国永远是“中央王国”。

毛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他于1923年任中央委員會委員。1924年，他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員會候补委員(这一阶段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合作的)。早在1925年毛就強調农民是革命的基础这个路线(和領導机关多数人主张“攻打城市”的路线显然不同)。当南昌起义于1927年失敗后，毛因为沒有遵守命令继续攻打城市而被撤掉中共中央委員的职务(尽管历史已经证明，他当时撤退他的軍队免遭无謂的牺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毛和朱德会师后，于1928年在湘赣边界建立了根据地，同年又被恢复为中央委員會委員。1934年他再一次和党的領導意見不一，并且被批評为“流寇主义”而降职。

毛担任了长征的司令官；当各方面軍到达遵义时，召开了一次紧急會議，通过了毛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路线，他就成为共产党的首腦，并且帶領一支部队去延安，这个地方在許多年里一直是党的革命根据地。

毛领导了抵抗日本侵略的运动，后来又领导了解放軍在国内战争中打蒋介石。在这一历史时期，他的正确政策和英明領導使他赢得了历史上肯定的地位。1949年9月他在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年来，对于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毛是負有大部分責任的——这个政策就使得批評像潮水似地汹涌而来，批評立即被制止了，于是成百的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被送到农村去“改造”。

1958年毛在另一个得意的計劃——人民公社的建立——上輸掉了。这种打算不经过发展农业的必要阶段而在“一夜之間”跳到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面去的企图惨敗了——就像工业战

线上的大跃进以灾难告终一样。到了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采取断然的步骤，改变了公社的规模和工作方法，才使愤怒的农民平息下来，使一些重大的错误得到纠正。

由于毛年事已高，不仅他自己不能批评自己的错误，而且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来批评他所做的和所说的。“毛主席”是不可能犯错误的，这种神话不断地传开了。

1960年我到中国后不久，我非常冒失地向一位领导干部问道，为什么所有中国的文件都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思想的领导”。难道毛不是党的一名成员吗？我这样问道；那么，为什么把他和党分开来？回答姗姗来迟，但是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党有时候是犯过错误的，怀特同志，但是毛主席一生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期里是有皇帝的，这些帝王认为他们也是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三、毛泽东周围的人

中国领导对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总理的指责之一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老是在变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增加了新的成员，而某些老的成员被淘汰了。

的确，中国倒确实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领导人一起都变老了；只要“红色达官们”继续不断地颂扬毛泽东而不对他的政策提出批评，他们的职位就可保住一辈子。

任何人只要和毛或者和最接近毛（甚至可能是决定政策的）的“激进派”的核心意见分歧，就必然会立即遭受排斥。彭德怀元帅的命运就是如此。彭是政治局委员、长征老党员，在朝鲜的“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国防部长；据说彭元帅就是不同意原

子弹是“紙老虎”的理論的。

再看看陈云的遭遇如何。名义上他仍然是政治局——这个政权内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七人常务委员会中的一員。唯一的无产阶级出身的最高领导陈云，在1958年大跃进前负责中国的经济政策。他不贊成毛的庞大計劃，因而就突然地在群众面前不見了。以后，在1962年，当这个国家从1960—1961年的困难时期（由于工农业上的錯誤再加上一連串的自然灾害而引起的）慢慢恢复的时候，中国的一家报纸《大公报》，发表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张照片，陈云在正中间，受到毛的热烈欢迎。

这张照片哄动一时。是陈云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还是毛和其他领导人终于承认陈的溫和政策是对的而他自己的是錯的呢？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以后的情况是陈云再一次又从公众舞台上不見了，據說是由于健康不佳而退休了。

最接近毛的人中间究竟那些人掌握大权呢？

无论从哪方面來說，“心腹之人”乃是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主席。他严峻、目光冷淡，人們认为，如果毛在今后几年內一旦去世时，他可能就是继承人。

一直到最近以前，朱德的名字在任何名单上一直都是在毛、刘之后而位居第三，但是这位七十八岁的坚强的老軍人、当年长征时的軍事指揮官，現在已老态龙钟了。

周恩来总理年已六十六岁，現在名次列居第三。他是一位漂亮的男子，看起来要比他的年龄小好几岁；他是中国最有才干的談判者。他是否贊同中国目前的“强硬路线”，在北京的外国觀察家們的猜测中仍然是一个問題；不管怎么說，他在执行党的政策。

“强硬路线”的两个拥护者是不可轻視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

六十三岁担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是“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这些以及其他中央委员在政策上究竟如何联合起来的，这就很难说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个人之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不和；究竟是否完全由于大跃进时期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有着分歧，或者还包括在国际政治战术战略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我就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可以奉告了。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一致要崇信毛是决不会犯错误的这种神话。所有的发言和文章都对毛颂扬备至。整个国家被教导着要歌颂他。

不妨听一听《东方红》这首歌的歌词，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游行时大家所熟习的首先要唱的第一支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年轻的小孩子的教导也没有被忽略，请看看《快乐的节日》的歌词：

“跳呀、跳呀、跳呀，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同我们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节日。”

从前，在另一个寓言和时代里，有一个孩子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也许中国的年轻一代有人在某一天会作出类似的事来，并且把毛又当作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四、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决定性的

1959年2月，中国全国各地在节日的气氛中庆祝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九周年。

《北京周报》报道说：

“在慶祝晚會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錢瑛是主要講話人。她在會上說：‘我們在蘇聯訪問時，亲眼看到不少工企為中國趕製設備……我們還看到蘇聯人民像培养自己的子弟一樣為中國培養建設人才，成百成千的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受到了蘇聯老師、同學和職工弟兄們的亲切关怀和热情幫助。’

“在重慶，重慶鋼鐵公司的工人煉出三爐特別鋼來紀念中蘇友誼。他們採用了最近來工廠參觀的蘇聯專家教給他們的快速煉鋼法。”

陳平在《北京周報》（1959年2月17日）著文說，“武漢長江大橋建造時，蘇聯給與了巨大的技術幫助。利用蘇聯的經驗，蘇聯和中國專家聯合設計的震動打樁機，它能把強大混凝土管柱沉入河床。利用震動打樁機打好管柱基礎的設計完全成功了。

“在科學技術合作方面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是很大的。許多已經在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一百五十六項工程的系統援助中實現了，後來又增加到二百一十一項。蘇聯又派到中國許多有經驗的專家給與技術協助，并協助訓練大批中國工程、技術、科學研究干部。

“感謝蘇聯的援助，中國獲得了基本建設設計的大批資料，成千上萬的機器製造和設備的藍圖以及工業生產的資料。由於利用了蘇聯在生產和科學技術成就方面的經驗，中國已經能夠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使用較少的技術人員解決許多技術問題——沒有這項幫助，中國就要用很長時間、經過繁多的試驗和差錯才能解決……”

“這些幫助包括的方面是很廣的，量也是巨大的。中國已經接收蘇聯各个方面多種援助，從重工業到輕工業、農業，從森

林业和水土保持到医学和公共卫生。

“在科学方面，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也是同样地大有成效的。1958年7月，中国的第一座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迴旋加速器开始生产，为中国打下了向原子科学进军和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基础。

“中国去年还試制成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从这两项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之能建立起这些现代科学，是和苏联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而这些成就不过是一些突出的例子罢了。”

在这个时候中国发表的声明仍然是现实的；他們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苏联給与他們国家的科学技术援助为他們的整个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自从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来早就有了一股变化的暗流，虽然毛在这个會議上曾发言說，“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四、五年里，苏联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說明以赫魯曉夫同志为代表的路线是更加正确的，而反对这个路线是不正确的。”

毛在1957年說得多好啊！但是在國內，中国领导人和毛对于苏联譴責个人迷信越来越担心起来。因为，如果斯大林的錯誤完全暴露出来而他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重新估价，那么毛又怎么能够排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呢？

表面上，中国领导人继续空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團結；但是毛周围的核心人物正在計劃把毛推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则是世界反帝斗争的中心。

五、錯誤造成了損害，但並沒有 阻碍中國的進步

我在中国将近四年，回到加拿大以后就有人問我：“为什么你不在你在中国所写的文章里写一写对毛的个人迷信問題，并且談一談你对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問題的看法呢？”

我的回答是，《加拿大論坛报》不是派我到中国去参加論战的；我的任务是記述工农业的情勢，如实地报道重大事件（會議、庆典等），拍发中国领导人所作的政治声明的实质的电訊。此外，我还訪問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北越、北朝鲜和蒙古——并且撰写了有关这些国家发展情况的文章。

我的报道从来没有受到检查；但是如果我要越出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而参加論战，就会从中国被驅逐出去。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来自苏联、羅馬尼亞、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英、意、法、奧等国以及路透社和法新社的记者——全都遵守这条規則。我在中国期間唯一勒令离开的是《环球邮報》的弗雷德·諾薩耳，原因不詳，也从来没有說明过。

至于中国人方面，他們的做法倒是正确的。只有一次的確是想影响我的政治見解。在加拿大共产党发表了表示不同意中国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其他等等問題的立場的信件以后，我被邀請到一位《人民日报》編輯的家里，問我有沒有“問題”需要“澄清”。我向主人确切声明我没有問題，我同意我們党的立場，我没有和我的中国朋友討論政治，不打算改变他的政治方向，也不希望他們試圖改变我的。我們就談到这里，以后也没有再找我談起有关論战的問題。

在工农业战线方面有許多无可怀疑的事实值得报道。工业上大跃进的失敗使经济失去平衡，而1960年的旱灾和水灾又增加了这个国家的困难。当时的日子的确是艰难的——艰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北京每棵树上的每片叶子都被摘下来制成維生素丸。营养不良很普遍，因而产生疾病和曠工現象；姑娘們和妇女們也受到影响，她們有的几个月不来月经；浮肿流行。公共溜冰場关闭了；学校里的全部体育課程也取消了。

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过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有千百万的中国人餓死，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粮食进行严格的配給，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分配，因而就避免了大批餓死人的情况发生。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于是我就詳尽地加以报道。我的报道是真实的，有的还在中国報紙上轉載了。

我写过：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清除貧民窟的运动；清洁卫生运动和广州附近的模范城市佛山的情况；珠江“船民”在陸地落戶的情况；妇女解放（仍是部分地，但和过去比較是跨进了一大步）；还写到儿童們的情况，他們全都讀书写字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些和其他各方面无可怀疑的事实都是值得詳尽加以报道的——因为它們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即便是这样，我仍然认为中国领导人犯了許多錯誤。

我以前在《加拿大論坛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曾经相当詳尽地叙述了大跃进时期农业上、工业上所犯过的錯誤以及种种糾正錯誤的步驟。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要談一談下面这种情况也就够了，就是，当我在大約八个月前离开中国的时候，有許多迹象表明，这个国家在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和领导人在計劃方面的錯誤并且经过調整和巩固的时期之后，正在准备着在

工业战线上作另一次的推进(逐步的推进)。

自从1963年以来，农业情况比较好，尽管中国现在还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进口成百万吨的小麦。但是，以亚洲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今天的粮食总的情况是好的。

1958年的大跃进顷刻之間可以使他們从一个貧苦落后的國家变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吃苦一年，幸福百年”是一句最流行的口号)这个中国人的幻想，在1960和1961年这两个坏年头里碰在現實的礁石上而先破灭了。

中国领导人今天又从过分相信一跃进就可达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轉而趋于另一极端，在另一种幻想中苦恼着，就是，社会主义要经过多少代才能建立起来。毛的“思想”現在已经产生了非科学、非馬克思主的“理論”，认为即便在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究竟“誰战胜誰”的問題，在不到“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期間內是不能解决的。

这不是辯证唯物主义而是辯证唯心主义；这是小資产阶级空想的“思想”，是脱离现实的。

六、民族主义：主要危险

我在今年1月20日《加拿大論坛报》上回答一系列关于中国的問題时，我曾提到汉族主义的增长是苦恼着中国的許多問題的根源，因而使得某些讀者感到吃惊。

“汉族主义(汉人占中国七亿人口的94%)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我写道。“中国在当前論战中所使用的傲慢語言并不是从社会主义中产生的，它是这个民族过去的遗产……

“虽然作了种种努力，特别是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向古老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但是，它在最近几年却迅速地增长

起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有些讀者所以感到吃惊而又不解的原因是，一直到那时为止，国际論战主要表現在下面这些問題上的分歧意見：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国际間的和平共处，等等。

正像我所回答的，我是想确切地指出中国在这些关键問題上所持的态度产生的根源究竟何在。我在中国的经验使我确信，围绕着毛澤东而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和个人迷信，就是这个謎語的答案。

4月間，苏联发表了苏斯洛夫2月14日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議上所作的报告全文，他在发言中說：

“在分析中国領導現今立場的根源时，不能不看到这种根源还在于越来越严重的、露骨的民族主义的、大国主义的意向，这种意向特別严重地表現在中共领导人的对外政策活动中。历史上不只一次出現过空喊的‘革命主义’同最狂妄的民族主义携手前进的情况。

“事實說明，民族主义在中国领导的整个政策中越来越占上风，正在成为他們行动的动力弹簧。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已经表現出来了。想出这个‘大跃进’，显然是企图‘用一个跳跃’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占控制地位。

“以后，这些倾向日益加强了。这反映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些行动上，例如围绕边界問題人为地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中共领导人在加勒比危机时期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核問題的立場。

“这些和其他一些事实暴露出中国领导人言行完全脱节。”

誰如果想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就必須研究中国历史；毛的态度和目的极相似过去中国許多野心的帝王。仅仅把所說的話加以比較，是絕不可能抓住当代論战的实质的。正如蒂姆·布克

所写的，中国领导人最擅长的是，竖立起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它打倒。

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中央王国”，而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看作是“蛮夷之邦”。今天所奉行的民族主义和尊崇毛为决不会犯错误的神，是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但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上是限制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上的原因所在。

为了追求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为邻边各国间的霸主，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还变更了疆界，并且要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国领导人正在进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阻止世界各地人民运动的前进。

为了这个原因，在不太远的将来举行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世界会议是必要的，以便决定为了加强所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间的团结，必须做些什么。

（译自1964年8月10日《加拿大论坛报》）

在核邊緣的那邊

“核戰爭以後的情況會如此可怕，以致那些即便是幸免于難的人們也情願死去而不願活着。”

伯特·懷特

美國飛機空襲北越港口的事件表明華盛頓決心在東南亞奉行侵略政策，從而帶來了這樣一種危險，即目前的“特種戰爭”會擴大成一場可能把其他大國卷進來而引起核戰爭的衝突。

在作者撰寫本文時，整個文明世界都希望這種危險的局面不會越來越嚴重；希望頭腦清醒的領導者們能夠找到消除危機的方法，從核戰爭的邊緣上退回來。

這正是1962年在古巴的對峙局面下所發生的事，當時，由於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和已故的肯尼迪總統所採取的明智態度，終於在最後一刻防止了一場國際性的大災難。

我們必須通過聯合國或者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來尋求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方法。

* * *

在危機極其嚴重的時刻，人們能夠強烈地感到核戰爭和以前的常規戰爭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在過去，戰爭曾經使人類的生命和財產遭到巨大的破壞，而原子戰爭則可能毀滅文明本身。

蘇聯國家原子能利用委員會副主席、科學家葉麥利揚諾夫最近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關於“自動控制系統的文化的革命”會議上曾斥責中國領導人的危險立場，即認為核戰爭“不是很可怕

的”，在核战争以后仍然活着的人能够“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千万倍的文明”。

叶麦利揚諾夫問道，“这些沒有理性的人們是否知道核武器是什么东西？”接着又說：

“我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消磨在研究原子能的利用方面，原子的强大威力是我所熟悉的。

“原子爆炸时，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大量的热能被解放出来，結果，泥土沸騰了，变成熔渣以及熔化成像玻璃那样的东西。

“成千成万吨的泥土、建筑物以及在它們里面或下面的一切东西都变为蒸气而升到空中。

“混凝土、砖和铁变成了蒸气。

“在这种熔化了的土地上，任何东西都不能生长。

“甚至虫类也灭絕了。

“被解放出来的放射性物质改变了大气。

“空气中充滿了放射性二氧化碳，使一切生物和一切不能呼吸便不能生存的东西都会中毒。

“放射性裂变的产物会沾污所有的水——河、海、洋——它們将被鈾分裂和鈚分裂的放射性产物所污染，因此，不再是維持生命的液体，而成为致人死命的毒素了。

“不，原子弹不是紙老虎——它是使全世界人民集体毁灭的一种可怕武器。

“有些人认为，核战争以后的情况会如此可怕，以致那些即便是幸免于难的人們也情願死去而不願活着，这些人的話是正确的。”

* * *

諾貝尔奖金获得者萊納斯·保林博士曾指出，美苏現有的

核武器足以毁灭比双方全部人口还多几倍的人口。他这样說，

“如果彻底毁灭苏联需要两万个百万吨級核弹，而据我估計美国現有的儲存量是二十四万个，那么，我可以說，我們有相当于需要量十二倍的杀伤能力；同样，彻底毁灭美国需要一万个百万吨級核弹，而苏联的儲存量是八万个，那么，苏联便有八倍的杀伤能力。”

保林博士作出結論說，現在必須達成一項国际協議來制止試驗一切核武器，然后再達成其他協議以實現全面彻底的裁軍。

人們会感到，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不同意这样做。但是，不久以前，当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一个未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高級官員”接見奥地利報紙《快报》記者时，據說那位官員曾經說：“如果在东南亚发生战争，这将不是一件坏事。”他又說：“如果我在美国，我会投戈德华特票。戈德华特对美国和全世界來說，都是好的，因为他会使美国的國內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大大加速事态发展的进程。”

不到一年以前，我在北京听到一个中学生說，教員曾经告訴学生，美国的核弹只是紙老虎，只能吓唬胆小的老鼠。这位教員說，除非核弹正好落在你身上，否則，你只要用一张白紙包住身体，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造成这种极端无知的責任不在于教員，而在于中国领导人。他們始終怕让人民知道核战争的实际情况。这些领导人自己并没有受騙，有一事实就說明这一点：他們正在花大量的金錢來执行一項試制原子弹的緊急計劃。

在現在这个核时代中，除非和平共处能够实现，否則人类是没有前途的。而这个政策肯定是要实现的。在所有的国家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爭取和平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务。尽管有戈德

华特和毛澤东这样的人，但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数的政治家都懂得，如果要文明继续存在，就必须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来代替战争。

苏联总理赫魯晓夫这样說过：“现代社会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只能在和平努力的領域內得到证明。任何破坏这项現代进步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的企图必然孕育着核灾难。所有的人都懂得达个道理。因此，胜利必将属于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在前进的时候将有助于巩固和平，并且越来越多地滿足每个人的需要和兴趣。这就是我們的信条。我們向一切政党建議，讓我們在达个領域內展开竞赛吧。”

* * *

我們不能允許今天在越南的危机扩大为一場大規模战争，因为大規模战争能逐步地变成全世界的核战争。安全理事会應該采取行动制止美国侵略者伸出的手。十四国日内瓦會議应当重新召开，就实现越南的光荣和平进行协商，以保证越南和老撾人民决定他們自己前途的权利。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應該正告美国：不要干涉北越；停止你們在东南亚的侵略。

(譯自1964年8月17日《加拿大論壇報》)

迫切需要召開會議

——對記者的談話

蒂姆·布克

加拿大共产党主席蒂姆·布克同志目前正在我国。他訪問了苏联各地之后，已于前几天回到莫斯科。《真理报》記者會見了蒂姆·布克同志并請他回答了一系列問題。

在談到加拿大共产党对筹备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建議所持的立場时，蒂姆·布克同志說：

我們認為召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新的国际會議之所以迫切需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目前已把他們的破坏运动发展到公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的程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建議指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會議的目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这既說明苏共中央希望通过相互諒解达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也說明苏共中央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自从1963年6月中共领导人发表了自己的对立纲領二十五点以来，一直在继续走着无原則地妄图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对伟大的列宁的党及其領導进行誹謗性的攻击，目的在于用极不正当的办法来影响不成熟的工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須給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运动以集体的回击。

加拿大共产党若干年以来一直采取这种立場。我們党在1960年初就曾公开提出如何对待中共领导的問題。那时我們就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我們原以为中国领导人宣布他們接受和贊同1960年11月各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全文是真誠的。我們是欢迎这一声明的。可是到1962年底，从北京直接給我党党员的宣传材料，已使我們深信，中共领导人宣布他們贊同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共同声明是虛偽的。

1962年9月，我党中央通过決議，指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新的国际會議是十分必要的。从那时起，我們就一直主张召开这样的會議。我代表我們党全体党员宣布，我們欢迎苏共中央所采取的步驟，这个步驟是符合目前絕大多数党所持的意見和观点的。

然后，蒂姆·布克同志談到，中国共产党对各兄弟共产党进行的顛覆活动。

蒂姆·布克說，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中国领导人掀起誹謗运动，就是打算对那些有忽視現實倾向的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施加影响。在这方面，中共领导人在托洛茨基分子那里找到了同盟者。目前，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已成为中共领导人路线的主要宣揚者。托洛茨基分子把中国领导人的口号拿来当作武器。他們成了中国宣传材料最积极的传播者。

由于加拿大共产党早在八十一一个党的代表會議之前就把批判中共中央领导的宣传和作法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国领导人的路线同我們党的纲領之間的矛盾从那时起就已经十分明显。我认为，加拿大之所以除了托洛茨基分子以外就沒有公开组织起来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力量，这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們党的经验表明，同中共领导人的顛覆活动进行斗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斗争本身，就是积极斗争，而不是无所作为地等待召开會議。

然后，蒂姆·布克同志又談到加拿大的國內政治形势，他說：

許多年来，加拿大共产党一直是为摆脱美国垄断组织在加拿大的統治而斗争的唯一的政党。近年来，在这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美国粗暴地施加压力，强迫加拿大同古巴断絕关系，阻挠加拿大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貿易，强迫加拿大同意在自己的領土上設置核武器。由于出現这些事件，加拿大各地响彻了惊天动地的呼声，要求政府維护自己的主权。

目前，加拿大政治力量的部署正在发生变化。一边是那些屈从于美国垄断组织专横势力、容忍在加拿大的国土上設置美国核武器并甘冒战争前途的人；另一边是那些越来越坚决地維护和平、主张裁減核武器和拥护和平共处政策的人。我們党要求加拿大宣布中立政策的建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反应。

（譯自1964年8月24日苏联《真理报》）

團結問題和召開世界各國 共產黨會議的必要性

蒂姆·布克

絕大多數共產党和工人黨都要求召開國際會議，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圍繞着那些聯合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原則和目標團結起來。存在着意見分歧而且某些分歧十分嚴重這一事實，是眾所周知的，決不應該縮小它的重要性。各國黨之所以要求國際會議在完成充分的準備後盡速召開，正是因為現在有必要立即採取行動來防止分裂。經驗表明，集體討論是消除分歧的最好方式。我們加拿大共產黨人認為，計劃召開的會議應該從相互同意的共同點出發，提出一個能够把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反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爭取和平、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共同鬥爭中聯合起來的廣泛的行動綱領。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分裂的危險已經愈來愈嚴重，而且恰恰是出現在這樣一個時刻：帝國主義反動派正在拚命地糾合軍國主義、復仇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妄圖遏制在世界事務中越來越起決定性作用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進展。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可能性在帝國主義者的計劃中是一項重要因素，這一點是加拿大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報刊都承認的。如果分裂得以避免，帝國主義者的種種努力便會成為徒勞。如果我們不能避免分裂，那麼誰能說將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分裂肯定會使社會主義在一個已經獲得許多成就的時刻延緩前進的步伐；分

裂可能使那些最近贏得政治独立的民族遭到挫折。因此，團結我們的运动和避免分裂，是每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

某些方面声称，會議将会“把某些党开除出世界运动”，从而加深分裂的危险，乃至促使分裂具体化。但是，这种說法已经为几十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通过的決議所駁斥。几乎每一項这样的決議在迫切要求召開會議的同时，都同样強調指出，會議的目的應該是團結我們的运动，而不是要开除和驅逐任何一个党或者是給任何人扣上侮辱性的帽子。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进行合作的形式，包括我們之間的團結的表现形式在內，都排除了針對任何一个党的組織措施。沒有哪一个党是可以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排斥出去的，除非是出于它自己的行动。

加拿大共产党把国际會議看做是一切兄弟党走向團結的一个必要步驟。我們认为这是八十一个兄弟党會議在其一致通过的声明中所号召的“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坚决維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的一部分。在建議召開的国际會議上恪守这一方針并制訂出集体闡述的協議来重申馬克思列宁主义无可爭辯的完整性，将保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兄弟党更加有力量和行动得更加有效。

低估中国共产党領導的立場同召開国际會議的必要性之間的关系，将是一个严重的錯誤。但是，如果认为最近几年除中国领导人的立場以外，其他一切都毫无变化，也同样是一种錯誤。在这期間，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提出了若干新問題，或者使一些旧問題有了新的重要性。这些变化符合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指出的方向，但是发展的速度却远非当时所能預料。对新問題作出

正确的和毫不含糊的回答，会为我們的运动开辟更广阔的机会。因为这些問題的产生是由于我們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所以向群众阐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将会加强我們运动的团结，进一步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吸引力，在更广泛的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民中扩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會議應該為如何以新的方式对待新任务和解决新問題提供一个榜样。它應該对这新的問題作出精确的、有科学根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从而帮助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同教条主义的危险作斗争。

苏联人民在全面走向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正在以駁斥了教条主义的方式证实若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性結論。这是理論和实践之間的关系的一个实例，列寧曾經引用歌德的話說明过这种关系：“我的朋友，理論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目前，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預告着殖民主义即将迅速消灭。各个新主权国家的人民現在无可避免地要采取实现经济独立的民族行动和政策，因为经济独立对保持他們的政治主权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應該在国际會議上共同研究和解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新問題。譬如說，在本国资本主义未扎根以前就已取得独立的各国人民，在什么条件下和采取什么政策才可以绕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列寧曾經指出，这类国家可以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做到这一点。現在是指出这种帮助的具体形式的时候了。

目前，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没有一致看法，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个問題：在某些新独立国家目前的条件下，小商品生产是否

就必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我们认为这并非不可避免，虽然我們同意，小商品生产提供了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土壤。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和资本主义的日益衰落，这些国家的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所有制和計劃因素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条件加在一起，就有可能利用小生产作为一个便于绕过资本主义的有价值的因素，作为一块走向这样一条道路的踏脚石：这条道路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却会为向社会主义前进提供比較有利的条件。

回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人民正在詢問：“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样子的国民经济政策？”正确的和毫不含糊的回答将会帮助他們選擇正确的道路，鼓舞他們对自己的力量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所提供的援助的信心。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一个例子，它說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八十一一个党声明指出过的某些事态发展的速度目前正在加快，也說明了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一系列这样的国家中，正在采取坚决措施把整个经济置于本国政府的监督之下。例如阿尔及利亚已经宣布它的国民经济政策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本身在生产、科学、文化、貿易和謀求人民福利等方面的能力和資源，正在使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不断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变化。帝国主义者长期借以损人利己的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发展的控制已经被粉碎。目前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发展。

并且，这种成就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間展开和平竞赛，而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速度更快的条件下取得的。

帝国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的意义，那些更反动的帝国主义代言人也不掩饰自己对和平共处的憎恨。随着社会主义日益接近它当前的经济目标，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帝国主义者便愈加疯狂地用尽千方百计来保持他们的制度。

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它还拥有巨大的资源，能够给世界和全人类带来难以估计的危害。诚然，它已经不能再为所欲为，但它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它是一只长着原子利爪和嗜血成性的老虎，它能够毁灭文明，如果各国人民听任它这样做的話。认为现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发生这种浩劫阶段的任何幻想，都應該由于这样一件事实而完全破除，即戈德华特的党徒在美国竞选期间，轻而易举地就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政党实际分裂。而实质上，戈德华特的竞选纲領就是反对和平共处。

如果考虑到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实行的疯狂的侵略政策，它对刚果事务的无耻干涉，以及林顿·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以来，在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策动的反动政变，聚集在戈德华特周围的反动势力的极端主义立场便显得更富有威胁性。

戈德华特在美国所体现的备战政策也是西德垄断资本政权中有很深的根子。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在西德的经济、军队、教育系统和政府部门窃据要津。他们要求修改联邦共和国东部边界，取得核武器和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好战叫嚣，表现了西德政府复仇主义政策的实质。同样的危险也表现在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和戴高乐主义的原子狂热病上。危险的种子也可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复活中看到。

上述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反动派正在广泛地加强努力，妄图集聚极右翼的势力，阻挠国内工人阶级的任何进展，把新民主主义的锁链套在新近独立和半独立国家的头上，在一切有机可趁

的地方支持亲法西斯的政权，煽起复仇主义和反苏的情绪，阻止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反动派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达到这些目的；迄今为止，帝国主义的矛盾和竞争一直使它们不能够有效地联合起来。但是必须考虑到，只有一切和平力量团结起来，才能防止帝国主义把人类推进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一致的行动，只有在这些力量比战争势力增长得更快的条件下，才能制止战争挑拨者和保卫和平。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

要想顺利地承担起各种新任务并使我们的运动在愈来愈广阔的阵线上继续前进，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团结：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强大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和平、民主、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我们认为，国际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应当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希望，筹备委员会从开始工作直到拟订它准备提交给会议的文件草案的全部过程中都始终强调这一点，并希望这也成为会议本身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团结的主要条件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为争取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自愿联合起来这些久经考验的基本原则原则上达成一致。这几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团结是所有这一切方面的体现。当参加会议的各党代表研究和讨论在日常斗争中运用各种原则的手段和方法时，可能有而且显然会有深入的并且时常是激烈的争论。不言而喻，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同志都必然坚持，会议赞同的那些斗争

形式應該考慮到他們本国的条件和傳統。但是，絕不容許用裝着革命詞藻的民族主义或者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們对于国际會議應該有什么結果的看法同中共领导人正在做的以及他們現在所宣揚的目标之間存在着尖銳分歧，低估这种分歧将是愚蠢的。只有坦率地正視这些事实并找到克服它們的途径，国际會議才能取得成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得到加强。

1957年莫斯科會議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負責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根据这项決議和多数党表示的尽快召开国际會議的願望，苏共中央指出，开始为召开一次国际會議进行筹备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建議筹备委員会拟訂将提交国际會議审查的主要文件的草案。筹备委員会可以討論涉及召开国际會議的所有問題并提出建議；它的各项建議和意見将送达一切兄弟党。

苏共中央意识到目前局势的复杂性，它早在1964年6月15日的信中就已经指出，會議也許不能够一下子就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取得一致意見。“但是，苏共中央相信，”这封信接着說，“即使會議的結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預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认为在會議上有可能就下述問題达成協議：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慮會議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見，在發現立場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領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

关于召开国际會議以及會議應該貫彻的目的，苏共中央宣布：“对于我们來說，會議問題是同維护和加强我們运动的团结問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們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

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須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

对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和整个国际会议的目的所抱的这种明智态度，是每一个真誠希望克服困难的共产党人所欢迎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拒絕了这些建議。

中国领导人企图把他們的立場和分裂活動說成是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他們的这种表白不免使人想起马克思在1852年評价法国各个政党的声明时所写的如下一段話：“……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應該把各个党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們对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①

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們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大声叫喊同他們实际的做法之間的距离，鮮明地表現在毛澤东和日本社会党人的一次談話上。

毛澤东向日本社会党人表明，他本人以及中国党和政府的其他領導人在实行着一种以培植反对苏联的偏見和敌意为重要部分的国策。除去描繪了这一政策的广泛的領土目的之外，他还示意日本很可以成为追求这些目的的一个伙伴。他向日本代表团說，“日本同中国應該共同行动，互相合作”。他甚至把伟大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侵占的苏联远东的滨海領土說成是不过“大約在一百年前”才“变成了俄国領土”的地区。他以下面的話結束了自己的談話：“至于千島群島，在我們看来这个問題是很明白的，它應該归还日本。”

①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0頁。

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甚至沒有提到他所說的这个地区曾一度是中国領土。他只是強調这块地方仅仅在大約一百年以前才变成俄国的領土。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美国总统示意日本帝国主义染指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其他沿海地区的領土，說“它們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还不到一百年”，加拿大人民会作何感想。

以上所談的还只是毛澤东关于可能作出的領土改变的广泛暗示的一个方面，他所暗示的領土改变甚至触及到中欧。毛澤东对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扩张野心的反映，这同那些在过去曾经多次給人类广泛带来灾难和痛苦的野心惊人地相似。

不可能忽視这样一件事实，即毛澤东同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所显示的扩张野心同中共领导人竭力在那些拒絕支持他們的共产党內部制造分裂的活动之間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领导人需要的正是建立一个維护他們的民族主义野心的国际网。

国际會議應該迅速举行

我們觉得国际會議不会有造成分裂的危险；与此相反，我們认为它将会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增加它的吸引力。必須对近年来变得重要的問題給予詳尽的和一致同意的回答，这些回答将成为恢复团结的有力杠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面临的危险是，那些希望集体地重新肯定这一运动不可动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基础的党，可能把采取行动的时间拖延得过迟。这种拖延将对中国领导人有利。他們的策略是显而易見的。他們想大規模滲入絕大多数党的企图未能得逞，因此現在就竭力来阻挠共产党和工人党巩固

的国际团结，而我们的运动如果要行动得完全有效，这种团结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领导人培植的分裂集团遭到工人的反对，不能代表任何力量，但它们正在工人运动中有意识地制造混乱，在一切有机可趁的地方恶化内部的关系。中国领导人在7月28日给苏共的信中吹嘘他们对于在某些党内成功地制造了分裂的叛徒的帮助，信中说：“过去我们这样做，现在我们这样做，不管你们怎样批评我们，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中国领导人阻挠国际会议召开的方法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待完成足够的准备工作，就应该立即召开会议。中国领导人认为，会议的筹备需要四、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因此过早地召开会议将造成分裂。他们抱怨说，在各党之间没有充分的磋商。他们声称，只有在世界上所有的党都赞成开会的时候才应该召开会议，哪怕只有一个党反对，会议也不应该召开。

实际上，世界各地都一直在进行着磋商，不仅是同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而且其他各党之间也在磋商；按照地理区域和各种政治问题进行双边的和多边的讨论、国际讨论会和互派党的代表团等等。这样的磋商已经举行了几百次。我们加拿大共产党的代表已经同许多党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派遣了以我们党的总书记为首的代表团去北京；在党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全会上、在省和地区的代表会议上以及在基层党组织都讨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此外，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过信。众所周知，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以和我们很相似的方式处理了这方面的問題。

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甚至拒绝同苏共举行有目的的双边会谈，他们以协商不够为借口就很不象样子。意大利共产党也曾

邀請過他們進行會談，但他們甚至不屑于答復。

認為必須所有的黨都表示同意才能舉行國際會議的說法，是對其他黨的一種侮辱，因為這意味著把一個或少數幾個黨的意志強加給絕大多數的黨。正是這種條件使得團結成為不可能。

主張國際會議應該過四、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再召開這一點更能說明問題。這表明中國領導人開始認識到，分裂各國共產黨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不像他們原來設想的那樣容易。1963年4月以前，他們曾經宣稱召開國際會議具有“迫切的和積極的意義”。他們現在却在玩弄花招以贏得時間。

中國領導人威脅說國際會議將標誌著正式分裂，這就使我們有理由問一問他們：“是由哪些黨造成分裂？”中共領導人只能代表自己說話。他們完全有權決定做什么；並且完全有權事先宣布他們的計劃，如果他們願意這樣做的話。但是，當他們以分裂來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黨的時候，他們却是自以為也有權代表其他黨說話。

遵循莫斯科宣言和八十一個黨聲明的路線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必須重新取得同中共領導理性地進行政治討論的可能性。但是，認為延期召開國際會議就能便利這種討論，將是愚蠢的。與此相反，這樣一次會議可以成為同中共領導人有成效地討論問題的講壇，有助於加強以集体制訂的立場為基礎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這一點本身就使得召開會議成為迫切的需要。

某些方面曾建議（例如陶里亞蒂同志的遺書就提出過這一主張），目前暫不召開國際會議，而應該先組織一系列若干個黨的會議來深刻地研究和集體地規定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目的和運動的各个部分面臨的任務。

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會否認兄弟黨之間研究共同問題的區域

性會議或者其他任何會議的價值。這種會議許多年來一直證明了它們的價值。我們黨就參加過許多這樣的會議而且將來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區域性會議不可能解決涉及所有的黨的問題。只有召開國際會議才能起這種作用。只有它才能成為代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論壇。

我們對新問題的詳盡答復、針對中國領導人散布的思想混亂而提出的立場以及我們為恢復團結而採取的主動，這一切都應該由聯合起來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作出；它們應該來自一次世界規模的會議，即使這意味著把我們的主動限制在那些可能達成一致的方面。

地方性的和區域性的會議以及針對具體問題舉行的會議，自然將成為國際會議的結果而產生，但它們卻不能代替國際會議。這也就說明，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許可以不召開國際會議以避免正式分裂的建議，是無視今天具體情況的。

在目前狀況下，某一個黨或幾個黨可能不參加會議。但是，只有在會議完成它的工作之後，“是哪一個（或者哪幾個）黨？”這一問題才會得到解答。

中共領導怎樣能夠為拒絕參加有代表性的國際會議找尋理由，我們很難想像。中共黨員自然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我們黨的領導人確實認為他們是正確的，他們何以不願意在國際會議上為自己的政策辯護呢？國際會議畢竟是一個表明和辯論許多觀點的論壇。我們的領導人何以不願意參加呢？”

中國領導人力圖從中立立場，從那些宣布“我們既不支持這一方，也不支持另一方，我們保持獨立”的人那裡撈到好处。儘管我們對那些硬說這是一種原則立場的同志們表示應有的尊重，我們却不能不認為，這实质上是推卸責任，它可能導致嚴重的錯誤。共產黨是從來不規避革命責任的行動的黨，它們必須

以自己立場的鮮明和為原則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來贏得勞動人民的信任。因此，這種黨的領導人怎麼能够對公然要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企圖守中立呢？不管它是否願意，每一個共產黨都被卷進了這場鬥爭，因此，沒有一個黨能規避它對我們運動的前途應負的責任，和它的國際主義義務。

* * *

由於情況複雜，會議也許不能在所有的問題上都取得一致意見。但是，重要的事實在於，會議在研究新問題的同時，能夠再一次肯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兄弟關係以及在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團結的路線。加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兄弟團結的關鍵就在於此。

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能夠聯合起來向勝利前進，走向和平和社會主義徹底勝利的基礎。這是鞏固世界革命運動和擊敗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途徑。這是加強社會主義國家、新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之間的兄弟關係的途徑。這是保證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保證光榮的蘇聯人民繼續全面地向共產主義迈进的途徑。因此，這也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牢固基礎上恢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途徑。

(譯自英文版1964年11月第7卷第11期
《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第9—15頁)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